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0月15日第20期 总第198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98期

“九一三”文献（三）

编者按

【我的错误】

1. 错误事实提纲
2. 错误事实
3.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一）
4.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二）

【我的交待】

1. 交待错误罪行提纲
——我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错误罪行
2. 我对错误的检查
3. 补充交待材料

【执行反动组织路线】

1. 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
2. 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问题
3. 干部初评

【整风】

1. 七一年二月司令部整风时我和杨运辉个别谈话情况
2. 七一年二月司令部整风时我和杨运辉个别谈话的补充情况
3. 杨运辉汇报43团机务大队一个机务中队的作风情况时我对杨运辉讲话情况

【本刊声明】

编者按

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一个现象分外辣眼睛，那就是态度。态度就犹如一个制高点，火烧身上时一定要对自己狠，如果不先把自己打翻在地、无限上纲、批倒批臭，首先就输了，输了态度似乎就输了一切，别的人怎么看你都不顺眼，就愈发激起别人对你的整治欲望。这种随之而来的围攻、打棍子、扣帽子，只许批之者说有，不许辩之者说无，只许批之者无线上纲，不许被批者据理申明的形式谓之“革命大批判”，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杨忠立这些宝贵的历史材料，毫无例外也是“大批判”的典型产物——自我批判。

杨忠立的检查、交待，从专案组写到学习班，再从“五·七干校”回来写到离休前；从称张春桥、王洪文为“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后四人帮时期与时俱进到了拥戴“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新时代。其批判的指导思想也从九大的“团结”路线、两条路线之争，到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三要三不要”，一条至高无上的党性贯穿始终；批判内容从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唯心论的先验论，到资产阶级法权属下的个人主义，完整地为我们展现了各个时期的政治风貌。这些检查、交待翻来覆去就围绕四个字：路线错误。何谓路线错误？标准是什么？就是毛泽东的几句话？于是你就算跟错了人、站错了队，甚至还“上了贼船”？看来看去，党还是同一个党，组织还是原来的组织，就因为忽然一夜间你的领导倒台了，你做过的这事也错、那事也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简直就无一不错，这黑锅你背定了。这一后果杨忠立在“九·一三”之前就是警醒的，并且一直在竭力避免，但最后仍然发生了，不幸被代表错误路线的“黑会”、“黑讲话”、“黑指示”言中，令人细思恐极。

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像是一幅宗教仪式感颇浓的场景：一位怀揣着革命理想却莫名跌入错的泥潭、挣扎在罪的崖边的信徒，无比艰难地进行着一场自我救赎的苦役——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彻底否定自己的所为，无情鞭挞自己世界观的同时又为自己苦苦辩解。杨忠立在检查中写道：“我所交代的错误、罪行完全是事实，我任何时候都承认，我对党负责，

对自己负责，对我所犯了严重错误、罪行事实永远不推翻。”“永远不推翻”的承诺并非是在模仿谁，他在隔离审查中的态度是理想与忠诚的完美结合，万幸的是他经受住了这场严厉的政治拷问，雨过天晴，而将这些材料留存下来的行为则印证了他的承诺，无惧后人评说。

我在整理录入时感受了他临渊的彷徨、苦闷与无助。那场燃烧了多少人青春的革命，产生出大量堆砌的政治化词语，极端而空洞，每个走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曾用它律己、律人。而当今天它们再次被娴熟地敲击出来，令我们这一代人不寒而栗，原来它们一直都在，仿佛不曾离开过。■

于鹏飞 2017.9.23

【我的错误】

错误事实提纲

一、错误事实

（一）跟王维国讲了一些错误言论

1. 对王维国等人进行了吹捧；
2. 讲了天才问题；
3. 讲了识别选择领导问题；
4. 讲了什么是“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的是一条红线”、“有人直接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和声音”、“两个誓死捍卫”、“四个基地”、“红四军”
5. 错误的讲了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情况；
6. 什么“应付几股势力的冲击”；

7. 宣扬了“空军作战文件”；

8. 所谓“一系列特大喜讯”；

先讲错误的观点，并进行扼要的批判，指出反对实质及其罪恶的目的。

（二）冲击了一些“骨干会议”活动

1. 七零年十月间关于介绍在北京解决南空问题的“骨干会议”；（王维国讲话）

2. 七零年十一月韩洪奎从广州回上海传达林贼之子讲话的“骨干会议”；

3. 七一年三月初林贼死党周宇驰在巨鹿路招待所开的骨干会议；（周讲话）

4. 七一年六月上旬刘锦萍在虹桥民航局召开的“骨干会议”；（刘锦平讲话）

5. 七一年“七一”晚上，郑长华、姬应伍在巨鹿路招待所召开的“骨干会议”；（关于林贼接见王维国女儿问题）

6. 七一年八月份王维国在四平路军部指挥所召开的“骨干会议”（讲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斗争上起带头骨干作用）

7. 七一年四月下旬王维国召开骨干整风会议；

8. 郑长华、姬应伍召开会议传达米家农向林立果汇报时林贼的讲话。■

【我的错误】

错误事实

参加请广州米家农的老婆和顾同舟的老婆、空司何部长、空李亚辉、空司郑处长的吃饭

（三）执行了王维国推行的错误组织路线。

（四）在工作上的错误

指示错误事实，批判错误事实

二 对错误的认识

（一）对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性质的认识

（斗争性质、严重性和危害性）

（二）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严重性和危害性的认识

（三）解决与林贼划清界限

三 犯错误的原因

（一）思想上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论，形而上学的看问题，分不清什么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因而上当受骗犯错误。

1. 形式主义的看问题，无鑑别的■

【我的错误】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一）

（一）“九一三”停飞、加强战备后议论的问题

1.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下午，裴斐从四平路军部指挥所给我（我在军指挥所值班）打电话说：“十三日停飞、加强战备后，我给空司打电话了解为什么停飞、加强战备的情况，找不到人。以后找到在空军总医院住院的鲁珉，鲁珉说他在医院没有回空司，也不了解情况。据空五军白军长讲：他打电话问熊应堂司令员了解情况时，熊应堂司令员告诉他有一个大干部要叛变。为什么要停飞、加强战备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我说：“为什么停飞、加强战备的情况我也不清楚，这次停飞、加强战备和过去不一样，根据你讲的情况可能是发生了什么问题。”

2.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上午，我和裴斐在四平路指挥所时，裴斐说：“从九月十三日下令停飞、加强战备以来，和空军的电话也打不通，空军也没有转发中央军委加强战备的指示，空军对加强战备没有任何指示和具体布置，空军现在是没有人管了，不进行指

挥了，不知道空军是怎么搞的。”我说：“空军过去不是这个样子，过去空军对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都是及时的直接转发的，并且及时提出贯彻执行的措施，要进行具体布置，实施指挥的；现在中央军委加强战备的指示都是大军区转发，并下达贯彻执行的指示，现在空军没有人管事，不进行指挥，很可能和空军领导有什么问题。”

（二）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措施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早晨，裴斐从四平路军部指挥所打电话给我（我在新指挥所值班）说：“军常委要召开师团干部会，布置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问题，要司令部先研究提出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措施的意见”，我说“请你就在军部召集有关处的干部研究好了。”裴斐说：“还是我们到你那里去，你参加在一起研究为好。”于是就确定十五日上午在指挥所召开有关处的干部会，研究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措施。

会议是由我主持的，裴斐和各处（除管理处外）干部都参加了会。开始时，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和南京大军区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命令的电报。我说：“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中心内容和要求是做好各机场、海军基地、港口码头的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准备。大军区已命令陆军部队各级指挥机关进入战备指挥所，部队已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和指定地区集结。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做好各机场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准备，空军部队也不应在机场外疏散（针对大军区要空军部队疏散讲的），而应在本机场内疏散，配置做好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准备。我们应以中央军委紧急加强战备指示提出的做好各机场的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准备为依据来研究提出贯彻执行的措施。”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加强战备的指示和防止冲击，我组织研究提出了以下加强战备的措施意见：

1. 各机场的歼击航空兵部队按照反空降、反机降预案，在本机场内进行部署和疏散，检查、恢复战斗编组，研究熟悉作战预案，组织好协同和指挥，搞好通信联络。各机场要保持一定数量的飞机担任战备值班。

我当时思想上认为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是要求做好各机场、海军基地的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准备，而大军区要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命令。要求军区各级指挥机关立即进入战备指挥所，陆军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和在指定地区进行集结；要空军部队进行疏散。既然是为机场的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准备，大军区军区战备的命令对陆、空军部队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要求，这和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的精神不一致，因此对大军区军区战备的命令不理解，怀疑大军区为什么要陆军部队进入阵地、进行集结，而要空军部队疏散？因而对大军区有戒备心理。我认为要做好各机场的反空降、反机降的作战准备，空军部队也不应该疏散，而应该在本机场内做好反空降、反机降作战准备。在此思想指导下，（未完——编者）■

【我的错误】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二）

一、按王维国的布置召开黑骨干会分析思想情况以及稳住机关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下午，韩洪奎告诉我“王维国要各部召开小型黑骨干会，分析一下‘九一三’信息、加强战备以来的思想情况，谈谈对加强战备的认识，研究一下稳住机关的问题，并将讨论的记录交给他。”

根据以上王维国的布置，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我在办公室召开司令部黑骨干会分析思想情况，研究稳住机关的问题。参加黑会的人有裴斐、叶蜚闻、裴寿生、唐明智、石志远（基本上是在家的部党委委员参加的）。会议开始时我说：“具体开会分析一下九月十三日停飞、加强战备以来的思想情况，谈谈我们的认识，和研究一下稳住机关的问题。”

大家发言反映了一些思想情况，表态性的谈了对停飞、加强战备的认识和态度，并对如何稳住机关提出了一些意见。最后我发言讲了以下问题：我说，为什么要停飞、加强战

备的具体情况不清楚，不管情况如何，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停飞、加强战备的指示，要集中精力搞好战备工作，保证完成战备。“要坚信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跟的是一条红线，是执行、捍卫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稳住机关、保证完成战备任务，当前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工作：

1. 及时掌握思想动态情况，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要及时了解、分析研究和反映思想情况，帮助解决思想问题，使思想保持稳定。

2. 各处、各支部要有针对性的组织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正确认识 and 对待停飞、加强战备的问题，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保证完成战备任务。

3. 战备工作要统一组织力量，科学分工，使每个人都有工作做，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4. 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请示报告。要令行禁止。

5. 加强各级领导，要按级负责，严密组织，作风要深入，工作要落实。

二、按郑长华的布置要求组织指挥所人员了解掌握情况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停飞、加强战备后，王维国要郑长华从硕放15师返回军，郑长华于九月十三日早晨返回军部，即在四平路军部指挥所组织了一套指挥班子（把在15师和26师等部队的工作组都收回来组织的），负责指挥所值班，了解掌握情况。

当时我还在新指挥所值班（师大指挥所），郑长华布置在四平路军部指挥所组织人员值班掌握情况的（此处去掉一个“是”）具体组织工作开始是由裴斐负责组织的。九月十五日下午军召开师团干部和军机关处以上干部会，布置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九月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指示后，郑长华要魏忠锦副军长到新指挥所换我值班，我于九月十六日回军部，从九月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按郑长华的要求，我和裴斐一起负责组织指挥所值班人员及时向部队收集了解和反映：

乘坐民航航班往来人员情况；陆军部队人员到各机场的活动情况；九月十八日以后，

陆军部队奉命进驻各机场情况；各部队贯彻执行加强战备指示情况；部队的思想反映和动态；接待驻机场的陆军部队情况和协同配合情况。

对收集陆军的情况除及时向王维国、郑长华反映外，每天晚上还要把每天所收集陆军的各方面情况（以上内容）综合起来写成材料向常委汇报（有时由王维国召集会，有时由郑长华召集会），供其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向部队提出指示要求。以上就是我参与组织指挥所值班人员收集了解掌握情况的情形。

三、一九七一年二十日上午军召开师团领导干部和军机关处以上干部会，进一步具体布置与进驻各机场的陆军部队加强团结、密切配合、共同搞好战备工作、保证完成战备任务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布置的准备工作和政治工作分由司令部、政治部研究提出，经常委讨论同意的，战备工作的内容包括三部：一是敌情（根据九月十三日）后总参谋部、南京大军区通报的苏修、美帝动态，活动的情况（综合的材料）；二是加强战备的目的意义和任务；三是与进驻机场的陆军部队加强团结、密切配合、共同搞好战备工作，完成战备任务的具体工作和要求。

九月二十日上午会议开始前王维国、郑长华、姬应伍召开常委研究确定：会议由郑长华主持，战备工作由我发言，政治工作由张启文发言。王维国指出：你们两个（我和张启文）发言材料上在讲这些加强战备工作的目的意义时要加上“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人民、保卫党而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粉碎苏修、美帝可能向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其他常委也有同意，于是我和张启文在干部会上布置我讲加强战备的目的和意义时，在讲为了“五个保卫”时都讲了“保卫林副主席”的内容。当时自己认为虽然九月十七日以后估计林彪可能有问题，但毕竟是什么问题自己也搞不清，现在王维国、郑长华、姬应伍及其他常委在“五个保卫”中提出“保卫林副主席”的内容总是会有根据的，以为他们已了解掌握了情况，同时也看到九月十七日以后的报纸上已登有林彪的名字，发行的画报上还有林彪的画像，而且听说“画报的内容还是江

青同志选排的”，也就讲了。

九一三事件以后，林贼死党王维国布置烧毁文件、毁灭反革命罪证及其他阴谋活动我都不了解，我也没有烧毁任何文件。

四对九一三以后的错误认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时以后，姬应伍打电话告诉指挥所作战处值班参谋梁振岚：“南空彭由副政委打电话给他，上级下令从现在起立即加强战备，全国一切飞机停止一切飞行。没有林彪、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命令任何飞机都不得飞行。立即通知各部队执行”

梁振岚把姬应伍告诉他的下令信和加强战备的指示告诉我（我当时在指挥所值班），我说：“下令全国全军停飞，加强战备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命令上没有提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字，是否在传达命令上有差错，立即向南空查对一下，再向部队传达。”梁振岚向南空查对时南空值班员说：全军停飞、加强战备的命令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字，彭由副政委传达时有遗漏和差错，更正为：“实际命令现在起全军加强战备，停止一切飞行，没有毛主席、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我立即打电话给姬应伍，告诉他“彭由副政委给他传达的停飞和加强战备的命令有错误，命令上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字。”我当时显然对下令停飞、加强战备的情况不清楚，但我坚信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组织执行停飞、加强战备的命令。中央军委十四日紧急加强战备的指示和十七日命令陆军进驻机场，配合空军部队做好反空降、反机降作战准备的命令，这在我思想上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二十日召集各师团领导干部进一步布置与进驻机场的陆军部队加强团结、主动配合、密切协同，共同搞好战备工作、保证完成战备任务的会，也是我建议召开的。

九月十三日停飞、加强战备后，林贼死党王维国已预感到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破产的下场，但他们反革命贼心不死，他以执行中央加强战备指示为名，针对南京大军区和上海关系，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企图垂死挣扎，布置要求稳住机关，甚至提出“五个

保卫”来继续企图蒙蔽欺骗群众，掩盖其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目的。

我却错误的认为是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加强战备的指示，保证完成战备任务，。按王维国和郑长华的布置要求召开司令部黑骨干会分析思想情况，研究稳住机关，做好战备工作，组织指挥所值班人员收集陆军情况，特别是在九月二十日上午还按王维国的确定，在师团领导干部会上布置战备工作时，在讲“五个保卫”时，讲了“保卫林彪的反动言论，继续为林贼死党王维国等做了坏事，适应了他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是自己严重的错误。我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怀疑大军区加强战备的命令，按王维国、郑长华的黑布置，错对南京大军区采取戒备措施，收集（此处去掉“陆军”两个字）陆军人员进驻情况，召开黑骨干会研究稳住机关，准备应付冲击等，继续为林彪死党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出力、效劳，干了坏事，完全适应了他的反革命的需要，是自己严重的错误罪行。■

【我的交待】

交待错误罪行提纲

我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的严重错误罪行

一、散布林贼死党江腾蛟、王维国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和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反动言论。



二、为林贼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

1. 吹捧林贼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
2. 鼓吹林贼及其死党推行的反动路线
3. 散布林贼及其死党阴谋分裂党的反动言论

（江腾蛟像）三、参加黑骨干会的活动（共八次会）

1. 参加各次黑骨干会的主要内容

2. 传达执行情况

四、执行了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反动的组织路线

1. 打击迫害好同志
2. 以执行林贼反动路线为标准选拔使用干部

五、在军事工作上执行了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黑措施

1. 按照林贼死党王维国的黑决定调动四个高机连搞反革命阴谋活动
2. 按照林贼死党王维国的要求领发黑武器为其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做准备
3. 在准备训练上贯彻了林贼的“两打”和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文件■

杨忠立

七月十五日

【我的交待】

我对错误的检查

前 言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

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人民。

林彪这个隐藏在我们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地、富、反、坏、右和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把“克己复礼”作为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并称为万事中的大事，中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林彪“天才论”作为“复礼”的力量纲领，他把自己吹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天马”自居，自比文王，妄图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他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狂妄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就是要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就是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国”在中国复辟，就是要“继”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绝世”，就是要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为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让那些牛鬼蛇神重新上台。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这就是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如果林彪反党集团“克己复礼”的反革命阴谋得逞，千百万人就要人头落地，我们马列主义的党就要变为修正主义的党，就要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我国就要复辟资本主义，成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全国人民就要重新回到黑暗的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受剥削、受压迫，当牛做马，过着悲惨的生活；世界人民革命的胜利不知要推迟多少年。当然，林彪反党集团“克己复礼”的反革命阴谋是决不能得逞的。正像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算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从孔老二到林彪要搞“克己复礼”、要倒退、复辟的反动派，都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碎。

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的总暴露、总破产，得到的可耻下场是必然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向前发展的，这是任何反动力量也不能阻挡的。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当然的沉重打击。我最热烈地欢呼这一伟大的胜利，衷心地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度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无限的仇恨，坚决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对其反革命罪行进行坚决斗争，彻底批判。

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房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坚决拥护党中央委员会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采取的全部措施。

我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我一定要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狠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彻底肃清其流毒，坚持革命，但对倒退。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要坚决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因此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为加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使自己真正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认错了人，站错了队，执行了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其搞反革命阴谋活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付了务，适

应了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在政治路线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现对我所犯的
错误和罪行检查如下：

一、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严重错误、罪行的事实（见专题材料）

1. 为林彪反党集团制造反革命舆论

吹捧林彪之子是“天才，全局之才”、“好领导”等。

散布“两个一切”和“识别选择领导”的反动谬论。

吹捧死党王维国是“好班长”、“领导核心”要明确他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再次肯定的”等。

鼓吹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所谓“红线”。

吹捧林彪的“两打”、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和“空军作战文件”。

吹捧建立“四个基地”和“红四军”、“好部队”，“顶逆风战恶浪”。

2. 散布林彪反党集团污蔑攻击论

散布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所谓“路线上的错误”，“镇压了群众”，“镇压‘516’反革命分子扩大化”，“对毛主席的安全不关心”。

散布污蔑攻击上海市委“否认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要搞两个专政机构”、“压四军”等。

3. 执行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在司令部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

按死党王维国的黑指示打击迫害了胡开德同志以及十多个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

按死党王维国“亲不亲，线上分”，“以我划线”的黑指示，在司令部提拔重用控制各处的领导权，为其修正主义路线服务；

按死党王维国的指示组织黑骨干进行阴谋活动，控制司令部为执行其反动路线的工具；

4. 参加黑骨干会进行阴谋活动

我参加死党王维国等组织的八次黑骨干会；

我在司令部组织了四次黑骨干传达了他们的黑指示；

5. 贯彻执行了林彪死党王维国为了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在军事工作上提出的黑措施，为他们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做了准备；

按王维国的黑指示给部队领发了黑武器；

按王维国、郑长华的黑决定组织部队进行“两打”军事训练；

6. “九.一三”以后的错误：

跟着王维国怀疑南京大军区执行加强战备指示的命令；

按王维国黑指示组织黑骨干研究稳住机关的问题；

按王维国、郑长华指示组织指挥所人员手机陆军陆军人员很多情况；

针对上海市委、警备区加强战备的错误；

二、对错误性质的认识

我在当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认错了人，、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跟着林彪死党王维国执行了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背离了马列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阴谋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了务、效了劳、卖了力，适应了他们搞反革命阴谋的需要，走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错误、罪恶道路，在政治上犯了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和罪行，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回想起来真是沉痛万分，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并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把我从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道路上拯救了出来，挽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使我重新做人，给了我以认识、改正错

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革命的机会。否则发展下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必然变为身败名裂的历史罪人。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就没有我的一切。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我永远不能忘记伟大领袖毛主席挽救我的恩情。

由于我站在错误的立上，执行了林彪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吹捧林彪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散布了他们贩卖的修正主义反动谬论，和他们造谣、污蔑、攻击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上海市委领导的反动言论，鼓吹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林彪及其死党把持空四军、控制空军、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了反革命舆论。

由于我在司令部执行了林彪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为他们组织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服了务，打击迫害和排挤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以执行王维国推行的反动路线为标准，“以我划线”，提拔使用黑骨干控制各单位的领导，以及组织黑骨干活动等，是军司令部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成为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林彪及其死党王维国推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机关和工具。贯彻执行了死党王维国及郑长华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系列黑指示、措施：给部队领发黑武器、私自调动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以及组织“两打”军事训练等，为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搞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了务，效了劳，帮了他们反革命的忙，起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的作用。我的错误和罪行是及其严重的，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由于我积极执行了林彪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了司令部的很多干部，使他们上当受骗，跟着我犯了错误，因此我要向司令部犯错误的同志负责，是我把他们带向错误路线的，我执行反动路线的罪过造成的，我害了他们，对不起他们。

由于我在司令部执行了林彪死党王维国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按照王维国、郑长华的黑指示，在部队积极贯彻执行了林彪“两打”、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作战文件、及军事工作上的其他一些黑措施，为林彪死党王维国在部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反

革命阴谋活动、妄图变我军为其反革命的工具服了务，效了劳，出了力，帮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忙，适应了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严重毒害了部队，把部队引向斜路，使不少干部犯了错误，给部队危害极大，给部队建设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这是自己积极贯彻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是自己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回想起来真是沉痛万分，对不起部队指战员。

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跟着林贼死党王维国执行了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在政治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和罪行。由于自己中毒深，“九.一三”以后较长时间没有觉悟过来，立场没有转变过来，态度不端正，曾对组织上对我采取的隔离审查曾有抵触情绪。三年多来，经上海市委专办和军学习班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对我进行了严肃认真、耐心热情的教育帮助，来挽救我，使我逐步转变立场、感情、态度，认识了自己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及其危害性，从而挽救了我，使我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革命。我心中认识到“九.一三”以后，组织上对我采取的隔离审查和军学习班的审查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应该的、正确的和积极的，完全体现了毛主席和党的政策，是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是对我真心诚意的教育挽救。如果不是组织上对我采取正确的措施和学习班领导、骨干同志对我的教育帮助和挽救，很难设想我能从财务的深渊中觉悟过来，重新做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革命。我衷心感谢党组织和骨干同志对我的教育、挽救，我一定要继续虚心、诚恳地接受组织上对我的教育帮助，在实际行动中改正自己的错误，使自己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争取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以补过于一万。

我所交代的错误、罪行完全是事实，我任何时候都承认，我对党负责，对自己负责，对我所犯了严重错误、罪行事实永远不推翻。根据我所犯错误和罪行的严重性，党给我任何严厉的处分都不过分，为了严格的那个的纪律和教育我自己，我要求党给我应得的处分，我绝不背包袱。一定要接受犯路线错误的沉痛教训，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自己今

后不再重犯路线上的错误。

三、犯错误的原因和教训

（一）我犯错误的原因

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虽然从小就参加了革命，但由于没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头脑里还存在着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烙印，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紧急党委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就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映和表现，因此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1. 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看问题是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由于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头脑里还存在着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观点和反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就是我接受修正主义思想、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土壤、天和思想基础，因此就不能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对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对毛主席的指示就不能自觉地认真学习、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就不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于是只看人的地位，不看其执行的路线，把反革命的黑线当成所谓“红线”来跟，因而对林彪及其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该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不仅没有抵制，反而成为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和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参与者。由于自己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头脑里还存在着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血统论和等级观念，认为林彪是大靠山，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跟他们“不会错”，有好处。这就在思想上接受和迎合了林彪及其死党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于是就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积极吹捧林彪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和他们抛出的唯心论的“天才论”、林彪的“两打”、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和黑作战文件等反动谬论，鼓吹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他们制造了反革命舆论，在司令部执行了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为他们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为林彪死党王维国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控制司令部帮了忙，鼓吹执行林彪的“两打”和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作战文件以及王维国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在军事工作上采取的其他黑措施，为林彪及其死党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效劳，适应了他们反革命的需要，与他们同流合污而犯了路线上的严重和罪行；甚至在“九.一三”以后，还没有很快觉悟，继续犯了错误，这不是偶然的，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必然结果。

特别是在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仍然形而上学的看待林彪：只看他的“接班人、亲密的战友”，看不到他反革命的发展变化；只看他反革命两面派的假象，看不到他反革命的实质；只往好处想，而看不到他搞反革命的阴谋诡计，因而竟达到盲目迷信而不能自拔的程度。由于自己看问题的立场、观点、过去不同，对毛主席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的一点意见”的指示，以及毛主席在批陈整风中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和警告，就不能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知道自己的行动。因而对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恶目的就认识不清，执行其修正主义路线就觉悟不了。“九.一三”以后，林彪死党王维国已预感到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破产的下场，他们反革命贼心不死，以执行中央军委加强战备的指示为名，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做垂死挣扎。我仍然执迷不悟，继续站在错误的立场上，跟着王维国等会议南京大军区加强战备的命令，按照王维国的黑指示针对南京大军区、上海市委采取戒备措施，组织指挥所人员收集陆军人员很多情况，召开司令部黑骨干会研究稳住机关，准备防止“冲击”，特别在师、团干部会上布置执行中央军委加强战备指示时，在讲加强

战备的目的、意义时，在讲五个保卫时讲了“保卫林 XXX”的反动言论，继续为林彪以及死党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处理、效劳，干了坏事，适应了他们反革命的需要。因此可见，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根本原因，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看待问题是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不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不破除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就不能树立无产阶级唯物论、辩证法的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感情就不能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只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彻底改造世界观，把思想上的路线搞正确，才有可能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才不识别、抵制修正主义路线，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改造或发送世界观的改造，必然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

2.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我犯错误的阶级根源

我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指导下，我站在错误的立场上，错误的认为：林彪接见王维国并赠送东西的所谓“一系列特大喜讯”是对王维国的信任、支持和再次肯定，是对空四军进行两条路线的支持，王维国后边有林彪这个大靠山的支持，我跟王维国是不会错的。只要紧跟王维国，得到其信任，就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可以升官、向上爬，对自己的前途发展有好处。于是我对林彪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拼命跟，还唯恐跟不上“会犯错误”。处于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私心，我就积极吹捧林贼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贯彻执行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黑指示，向他们讨好，不是效忠，以便得到他们的信任，来达到自己个人主义的目的。党林彪死党王维国对进行拉拢腐蚀，要我参加黑骨干会，在司令部为他们组织进行罢官夺权和主持司令部工作时，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信任，更有奔头。这就更助长了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恶性发展，于是就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党的原则，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跟着林彪死党王维国积极地为林彪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进行反革命有内涵的服务、效劳、卖力，成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搞反革命阴谋活动

的工具，适应了他们反革命的需要，使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这正是我世界观未得到改造，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名利地位、高官厚禄、向上爬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反映和发展的结果。林彪死党王维国正是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拉我，腐蚀我为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我思想上因有这种土壤和条件，就接受，迎合了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并积极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卖了力。

我对林彪死党王维国有的问题提法和做法上也曾有过感觉，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为了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而擅自得到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不让向上级请示报告，自己也知道是违背中央军委关于得到部队的规定的秘书破坏军队组织纪律的行为买单为什么又不能坚持原则，坚持要请示报告呢？（曾向郑长华提出过要请示报告的意见），主要是立场站错了，认为有靠山。

3. 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马列主义，头脑里没有毛泽东思想，对真假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与唯心论的先验论、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识别不了，分不清，因而受骗上当，执行了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是自己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就在于：自觉地克服、清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及时识别已经产生出来和正在产生出来的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不学习，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当修正主义思潮来时就会由于自己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分不清而上当受骗、犯错误。我因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迷失了方向，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因此，只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路线斗争觉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才能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才不会上当受骗犯错误。

同时，怕犯错误、怕挨整、怕受打击、怕丢官，而不敢坚持一定要向上级请示报告，中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等级观念在起作用，因而放弃了党的组织纪律性，所以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接受和产生修正主义思想、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由于我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因此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就不能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正确路线、批判错误路线，必然成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而走向犯错误的道路。

事实证明，我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如不彻底改造世界观，彻底转变立场，克服旧的思想态度，就会变修正主义，而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利用的工具，给党和人民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所以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阶级根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法权思想就是我犯错误的阶级根源；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脱胎换骨地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坚决彻底地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彻底转变立场、态度、感情，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立场

（二）我犯错误的主要教训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揭示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概括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和实质，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给我指明了犯错误的原因，应接受的主要教训和今后再不重犯错误的正确道路。对照检查，没有遵守和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是我犯错误的最大教训。

1.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是三要三不要原则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是革命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搞马克思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背离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背离党的基本路线，就必然搞修正主义，就要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就一定要犯错误。我违背了这个最基本的原则，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林彪死党王维国搞的是修正主义，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我最大的错误和罪行。林彪及其死党为了实现其“克己复礼”、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竭力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冒充唯物论的反映论，用唯心史观反对唯物史观，他们把唯心论的“天才论”作为“复礼”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纲领，并把自己打扮成“天才”和“全才”大肆宣扬。我也跟着林彪死党王维国吹捧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散布和宣扬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天才论”和世界观反动谬论，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大造反革命舆论，为其进行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做准备。由于我站在错误立场上，执行了错误路线而对林彪及其死党以上贩卖、鼓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黑货和反革命阴谋，不仅没有识破、抵制和反对，反而加以吹捧、散布并贯彻执行了，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反革命阴谋制造了反革命舆论，适应了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作了林彪反党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而使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没有遵守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个级别的原则，是我犯错误的最大的教训。只有接受这一沉痛教训，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真正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彻底改造世界观，转变立场，坚决遵守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才能使今后不重犯路线上的错误。

2. “要团结，不要分裂”，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大多数人民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毛主席在九大开幕时候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有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团结是革命事业胜利的保证，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革命的团结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我们

党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历史的经验证明，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没有革命的团结，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彻底解放。与此相反，林彪反党集团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专门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利益根本对立，在组织上必然要搞分裂。他们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拉山头、搞宗派，结党营私，培植反革命势力，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推行“逆我者亡、顺我者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组织路线，阴谋陷害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他们疯狂的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竭力破坏我党、我军和革命队伍的团结，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最后发展到搞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全面分裂党，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实证明，林彪是最大的反革命分裂主义者，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奴才，他们分裂党的反革命阴谋是决不能得逞的，是注定要彻底失败的。

我站在错误的立场上，跟着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参与其大搞分裂活动。我散布了他们造谣、污蔑、攻击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南京大军区许司令员、上海市委领导同志，以及南空领导的反动言论，为他们阴谋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制造了反革命舆论。我在军司令部执行了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反动组织路线，为他们组织进行反革命的罢官夺权服了务，打击迫害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以执行王维国推行的反动路线为标准推荐选拔黑骨干活动。搞的是分裂活动，破坏了党和军队的团结，是为林彪死党王维国搞分裂阴谋服了务，效了劳，适应了他们搞的阴谋活动的需要，背离了党的九大路线。

从犯错误的事中使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提出“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原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搞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团结，要坚持和维护党的团结，就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与一切破坏团结的希望和分裂活动进行斗争。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与分裂作斗争中实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分裂党的阴谋，使我们党更加纯洁、

坚强、统一。防松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必然会造成党的分裂，就是背离、放弃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斗则进，不斗则修。搞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团结，没有不要团结、不反对分裂的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必然要搞分裂，搞分裂的也必然搞的是修正主义，没有不搞分裂的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原则，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划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标志。自己犯错误的重要教训，就违背了这一原则，没有坚持团结，而搞的是分裂，推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必须认真接受这一教训，只有坚持“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原则，才能识别、抵制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再犯错误。

3.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大多数人某利益，代表；革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坚信真理在自己一边，群众在自己一边。因为任何时候都“光明正大”，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敢于公开宣布自己的革命斗争任务，以及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从而阻止动员广大革命群众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奋斗。”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斗争的胜利，总是坚持革命团结、坚持光明正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搞马列主义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林彪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为少数剥削阶级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手中没有真理，就只能靠施展地主资产阶级的阴谋诡计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的反革命纲领和主张是见不得人的，既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也经不起群众的鉴别，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暴露之时，就是他们灭亡的来临。因此，他们只能靠阴谋诡计，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用“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阴谋手段，用假象欺骗群众。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组织黑骨干开黑会、讲黑话，扇阴风、点鬼火，造谣惑众，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搞反革命阴谋活动。

我由于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同样跟着林彪死党王维国参与了他们搞阴谋诡计的活动。我参加了他们搞阴谋诡计的活动而召开的八次黑骨干会，听信其搞阴谋诡计活动的鬼话，自己在司令部也照样组织力量四次搞阴谋活动的黑骨干会，传达他的黑讲话、黑指示来欺骗下面，为他们搞阴谋活动在司令部组织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效了劳。在为林彪死

党王维国搞阴谋诡计活动调动高炮三师四个高机连到军部和江湾机场时，我还把他们搞阴谋诡计活动，错误的认为是“保密的需要”，并为领导各高机连的领导班子提供了“修建办公室”的名称，违背中央军委调动部队的规定，同意郑长华调动高机连不要向上级请示的意见，因而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参与了搞阴谋诡计，又为他们搞阴谋诡计服务，适应了他们阴谋诡计活动的需要，没有坚持“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也是我犯错误的严重教训。要光明正大就要坚持党的组织原则，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搞阴谋诡计，就一定要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只有坚持要光明正大，就会使搞阴谋诡计的人失去市场，现出原形，而防止犯错误。否则就要犯严重错误。必须吸取这一极其沉痛的教训。

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指示无产阶级党性的集中表现；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指示党内一切机会主义头子的地主资产阶级本性的反映。坚持还是反对“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是两种世界观尖锐的对立，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只要自觉地遵守和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就能增强识别和抵制修正主义、分裂倾向、阴谋诡计的能力，就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积极、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违背“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就是搞修正主义，必然要犯路线上的错误，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一定要接受因违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而犯严重错误这个教训的最大教训，使自己再不重犯路线上的错误。

理论是路线的基础。“没有革命的力量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斗争。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搞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自觉地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要不要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放弃学习，就是丢掉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个基本原则，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反革命谬论的实质就看不清、识不破，就分不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林彪反马克思

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什么是摆脱或削弱党的领导，因而受骗上当，背离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俘虏，成为林彪反党集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人，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指示我犯错误的重要教训。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把两条路线斗争提高到理论上来加以认识解决，才能自觉地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保证。因此必须接受过去不学、不懂马克思主义，而受骗上当、犯错误的教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解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如何自觉地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问题。认真看书学习，一定要结合批林批孔斗争，联系方向、路线的实际，抓住路线问题就抓住了最大的实际。要克服过去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要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觉地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为加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忘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理论和实际的分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真正学到。这也是我过去没有学懂马克思主义而犯错误应该吸取的教训。

四、改正错误的决心和措施

（一）一定要进一步认识自己的错误，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要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继续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不真正认

识、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继续革命。我一定要痛改前非，要继续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修正主义谬论，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进一步在思想上清算自己的错误，彻底肃清林彪反党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坚决彻底地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要进一步彻底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和态度，一定要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挽救，要老老实实认识自己的错误，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对自己在政治路线上所犯的严重错误，任何时候都决不翻案，一定要接受犯错误的沉痛教训，而且终身不忘。要把犯错误的教训转化为促进自己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的积极因素，不背思想包袱，要重新做人，使自己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跟着名字现在继续革命到底。

（二）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要把“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作为毕生的任务，克服头脑里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真学习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到底。必须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逢迎腐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与批林批孔抵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学习贯彻执行十大文件结合起来，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狠批孔孟之道，深挖林彪反党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肃清其流毒；深刻领会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自觉地为实现十大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奋斗；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要经常学，反复学，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的教导，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

主义的能力，积极、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自觉地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接见遵守和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要以“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为标准来鉴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修正主义，用加强团结来反对各种分裂倾向，坚持光明正大，反对阴谋诡计。提高自己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坚持正确立场，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要自觉地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不符合“三要三不要”原则的就坚决抵制、反对，保证自己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革命，再不重犯路线上的错误。

（四）加强党的观念，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决心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争取继续为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一定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不悲观、不消极，要自觉地、积极的锻炼改造自己，要经常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照检查，严于解剖自己，虚心接受群众监督，坚决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树立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自己真正成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自己的晚年能为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继续革命到底，就是自己唯一的心愿。■

【我的交待】

补充交待材料

由于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打着红旗反红旗，搞反革命阴谋诡计，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受骗上当，认错了人，跟错了人，站错了队，执行错了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错

误的事实和问题都已经交待过了，现对一些问题的具体情况做如下补充交待：

一. 传播了一些王维国等人讲的错误反动言论

王维国等人互相吹捧和讲的错误、反动言论，是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我进行了一些传播，实际上就是替阴谋活动制造了舆论。这是严重的错误，除已交代的外，补充事例如下：

1.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我在军召开的科、团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讲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路线斗争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完全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错误地用毛主席的哲学观点，把王维国在军司令部推行的错误路线、对好同志进行打击迫害，说成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毒害了干部。实际上是替王维国等人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了舆论，这是我严重的政治原则错误。虽然这个发言材料是几个人研究写的，但我要负责任。

2.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我在军党委召开的科、团干部批陈会上，在批判陈伯达反革命罪行时，联系讲了识别、选择领导问题。叛徒、卖国贼、反革命分子林贼的死党王维国、周宇驰讲识别、选择领导，是吹捧林贼等，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原则和党的组织纪律性，为他们搞分裂党、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我讲识别、选择领导，实际上也是替他们制造了反革命的舆论，这是严重的错误。这个发言材料虽然也是几个人研究写的，但责任应由我负。我所讲的识别、选择领导的内容如下：

像陈伯达这样大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我们事先没有识破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甚至有不少干部跟着错误的领导执行了他们错误的路线而犯了错误？原因就在于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去鉴别他们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因而上当、受骗、犯错误。这就说明在路线斗争中，对每个人来讲都遇到一个识别、选择领导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间是要经过各级领导，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直接带领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识别、选择了正确的领导，在正确领导带领下，就会保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路线斗争中就不会犯错误，否则，在错误

领导带领下，就会跟着执行错误路线，背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犯错误。

识别、选择领导，在组织上我们不能决定，那是上级领导决定的问题，但在政治思想、路线方面完全有选择的权利。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就要支持，贯彻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领导，就要抵制、反对。识别、选择领导主要是看他执行什么路线，而不是看形式、看表面、看他的职位高低和资历长短。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就是好领导，就要紧跟；否则就是错误领导，就不能跟着他犯错误。究竟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要看他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光听他口头上讲。

识别、选择领导，选准是前提，识别、选择不准，跟错误领导越紧，背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远，选准了就要紧跟，就会跟着正确领导步步走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选准了，不紧跟就会掉队。

3. 一九七一年四月份，我在军党委整风交心会上吹捧王维国是“好班长”，“路线斗争中他是站在正确方面的”。同时对胡开德同志和郑刚同志错误地进行了批评、攻击。这也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把推行错误路线的王维国说成是“正确”的，打击了好同志，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是我执行错误路线的严重错误。发言材料虽然是其他几个同志写的，但我要负责任。

4.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司令部在进行路线斗争教育时，按照军政治部和政治处的统一布置、要求，我向司令部的干部宣讲过由军政治部统一编写的关于路线斗争教育材料，这个路线斗争教育材料，从党的两条路线斗争开始一直讲到空四军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完全是林贼及其死党吴法宪、王维国等推行反动路线、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舆论的，它严重歪曲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把林贼吹捧伪装成执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者；对空军内两条路线斗争情况，也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欺骗、毒害了广大干部、战士。我宣讲这个路线斗争教育材料的表现，是我严重的错误。我记得胡寿昌同志根据这个路线斗争教育材料写的提纲，我在军办的参谋班也讲过。

5. 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在领航科长会议上讲话时吹捧了《空军作战文件》（林贼之子

林立果写的），并要求在领航工作中贯彻落实，来进一步研究解决在未来反空袭作战中的指挥引导问题。这不仅替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了舆论，也是在军事工作上执行反动路线的表现，是我严重的错误。。

二. 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1. 一九七一年征兵时，王维国曾说过：除空司兵员会议确定分配给我们的女兵数目外（兵员会议分配的女兵数实际上是干部的女儿参军数，这是由军常委具体确定分配名单，由军司令部军务处具体办理的），空司王飞同意我们另外增征一、二十名工人、贫下中农出身好的女兵，“要掺一些沙子”，因为现在每年征的女兵都是干部的女儿，女兵完全是干部子女不好，所以要征一些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兵。增征的这些女兵由李松亭、蒋国璋他们负责组织。

我把王维国说的要增征一些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兵的事情告诉了军务处王辉章。当时我认为增征这些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兵，可能是给“公检法”李松亭负责的单位（警卫处）使用的，因为他们是搞保卫工作的，保密性很强，对工作人员的政治质量要求很高，所以由他们自己负责征、接所需要的女兵。以后，又听说（李松亭没有和我讲过他们征女兵的事）李松亭那里征了十几名女兵（是李松亭派人直接到军后勤部领军衣，因不合乎手续，后勤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才知道），就更信以为真。七一年五、六月蒋国璋据说从浙江省给军打字室征来了两名女兵打字员，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王维国要增征一、二十名女兵的情况。他们究竟从何处、征、接了多少女兵，分配到哪些单位，在征、接女兵问题上搞了些什么反革命阴谋活动，我都不了解。

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和过荒淫无耻、糜烂透顶、腐朽没落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活，到处选美女，搞特务，真是干尽了坏事。为了欺骗群众，掩盖其反革命的真面目和罪行，则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以征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兵为名挑选美女，搞特务，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为实，真是反动透顶，可恶至极。

2. 一九七一年春天，王维国在办公楼告诉我：有一个姓罗的女同志，要放到司令部打

字室来培养，还要调个教员来帮带她，主要是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教员由干部处张兆玺负责选调，其他由陶宗义负责，你们给准备住的房子。我也是这样向军务处、保密室、打字室交待的。过了一、两天，小罗（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和教员曹雪琴（第一医院的司药）由陶宗义领着直接到了打字室，小罗和教员曹雪琴到打字室后，完全由陶宗义负责管理和教育，并规定别人不能过问他们的问题，不能随便外出参加别的活动，要外出时得经陶宗义批准。有一次小罗家里的什么人要离开上海，小罗要请假去送行，因找不到陶宗义，军务处保密室的领导就让她去了，结果受到陶宗义严厉的指责。我当时认为小罗可能是给什么领导培养打字员或保密员的，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过问过她们的事。陶宗义也从来未和我谈过小罗之事。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小罗放到打字室培养的情况。至于小罗是何时参军的及其他情况我都不了解。

小罗是林贼死党王维国亲自安置、由陶宗义专人负责掌握管理，是很神秘的人物，肯定是他们为林贼选美女、搞特务、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搞得卑鄙无耻、见不得人的罪恶事实之一。

3. 一九七零年冬天一天晚上，在军部礼堂看戏时，林贼死党王维国告诉我：他们在庐山开会时（九届二中全会）搞招待工作的一个女同志是九江人，现在来上海要求参军，现在住在巨鹿路招待所，告诉军务处给她办理一下入伍手续，分配到第一医院当卫生员。第二天我告诉军务处王辉章将这个女同志介绍到第一医院去，并说如果现在不好办理入伍手续时，可等到明年征兵时有人去江西九江时可顺便办理一下入伍手续。这个女同志的其它一切情况我都不了解，何时来上海，在巨鹿路招待所住了多久，以及到第一医院后的情况，我也不知道。

4.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大约是十五、六日）一天下午，空司情报部贺部长（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贺德全——编者）坐飞机到上海，到机场去接的人有：王维国、郑长华、姬应伍、裴斐、杨忠立、李鸿均、胡锦涛、梁金钟、蒋国璋、叶蜚闻、王学仁、成关林等人。贺到巨鹿路招待所住下之后，紧接着王维国就请贺吃晚饭，参加吃饭的人有郑长华、姬应

伍、裴斐、李鸿均、杨忠立、胡锦涛、叶蜚闻（叶蜚闻是王维国指定负责招待贺的），在吃饭时互相进行了吹捧：王维国说，欢迎贺到上海来，向北京机关（空司）“造反派”学习；贺说，感谢王维国、四军对他们们的热情招待，向王维国学习，向空四军学习。其他人在敬酒时也说了向机关“造反派”学习的话。吃饭时没有谈别的问题。吃饭后我们就回军部了。贺在上海时我再没有和他接触过，也没有谈过什么问题，贺在上海时和王维国搞了些什么活动，以及何时离开上海的，我都不了解。

贺到上海来，林贼死党王维国很重视并亲自到机场去迎接，肯定是为林贼及其死党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活动。

5. 一九七一年二月份，空司作战部李亚光带领十三个参谋到上海参加我们军部队第二批拉练。他们来、去时我参加了在车站的接和送，也参加了请他们吃饭，除此而外没有和李亚光等人接触，也没有参加他们任何活动。参加吃饭的我记得有：王维国、郑长华、姬应伍、杜贵珍、武杠桥、裴斐、李鸿均、胡锦涛、戴洪学（是梁金钟等指定去负责招待的）。他们回北京前请其吃饭时，高炮三师的师长、政委也参加了。吃饭时互相进行了吹捧：感谢王维国、郑长华（第二次是郑讲的）说，感谢北京机关“造反派”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向空军机关“造反派”学习，欢迎和感谢他们对我们部队工作的指导和帮助等。李亚光说，感谢空四军对我们的热情招待，亲切的关怀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这次来是向空四军学习的，经过在部队一个多月的实际学习和生活，使我们感受很深，受教育很大，部队的深厚感情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深情厚谊带回北京去。李亚光来上海时到车站接的有二十余人，回北京时到车站送行的大约有五、六十人，除军机关的人外，高炮三师、八师、航空兵二十六师都派有代表参加了送行。

李亚光等这次来上海跟高炮三师部队拉练中，为林贼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在高炮三师通过作报告、开座谈会和个别交谈等方式，大肆吹捧林贼父子，把高炮三师搞的乌烟瘴气，严重的毒害了广大指战员。他们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搞的，这也是林贼死党王维国后来在会议上一再宣称：高炮三师路线斗争教育搞得“好”，对林

贼父子的所谓讲用报告组织学习的普遍、深入，效果好，要其他部队向高炮三师学习的主要原因。

6. 关于林贼死党王维国和郑长华要军械修理厂仿造小型冲锋枪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四月的一天，在军党委会议室开会中间（军和部的负责人都在场，我也在场），郑长华说：“现在某工厂生产出来一种小型冲锋枪，很适合飞行员使用，准备要军械修理厂仿造一部分发给飞行员。”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要军械修理厂给飞行员仿造小型冲锋枪的问题。我也没有看到小型冲锋枪是什么样子。王维国、郑长华什么时候具体向军后勤部胡锦涛（军修厂归后勤部领导）和军械修理厂领导交代仿造小型冲锋枪任务的我也不知道。王维国、郑长华再也没有和我谈过关于仿造小型冲锋枪的问题。因为这是军后勤部管的事情，我也没有过问此事。

几天之后，在军党委会议室开军党委整风交心会（扩大会议，各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也参加了）时，军械修理厂宋仁堂向胡锦涛提出：“关于要他们仿造小型冲锋枪的问题，请军党委给军械修理厂党委写一封信正式下达任务，便于组织力量进行。胡锦涛向我讲了朱仁堂要求写信的事，当时经王维国、郑长华同意，用军党委的名义给军械修理厂党委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负责给飞行员仿造小型冲锋枪，请他们很好组织力量完成仿造任务。因为当时是在司令部办公楼开会，胡锦涛就便要司令部给写一下这封信，我就要叶蜚闻给写的信，其内容大意是：由军械修理厂负责给飞行员仿造一种小型冲锋枪，请他们加强领导，很好组织力量完成此任务。信经王维国、郑长华看过后，由胡锦涛当面交给了军械修理厂的朱仁堂。所以我就一直认为是给飞行员仿造小型冲锋枪的。

一九七一年六月间的一天，军械修理厂仿造的小型冲锋枪在三院（原政治干校）室内靶场试射时，胡锦涛要我和他一起去看一次试射，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要仿造的小型冲锋枪的样子。在场的有宋仁堂和三个干部、工人。试射不很成功，枪故障，我们就回来了。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王维国、郑长华要军械修理厂仿造小型冲锋枪的情况。

林贼死党王维国仿造小型冲锋枪完全是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做准备的，他们所谓

给飞行员仿造小型冲锋枪是假的，是欺骗群众以掩盖他们反革命的罪恶目的，仿造小型冲锋枪为他们搞反革命政变做准备是真的。这些反革命家伙都是人面兽心、反动、残暴之极。

7.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空司作战部两个领航参谋（一个是原26师领航科副科长调空司人参谋的，名字记不清了，曾和李亚光一起来参加过高炮三师的拉练）来我们军了解领航工作情况。他们和领航处林玉其谈了之后，提出来要和我谈一下，他们就要下部队去了解领航工作情况。我当时在指挥所值班，一天上午就在指挥所会议室见了他们，领航处林玉其也在场。他们说：我们这次下部队主要任务是了解领航工作情况，也是来向部队学习的。

我们先到了沈空部队，在空四军了解之后，有时间还准备去航空兵三师了解一下，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现在有些部队对领航员的培养训练放松了，对飞行员也不进行有关的领航训练了，领航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有些飞行事故的原因是直接和领航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队领航工作今后如何搞法，领航训练究竟如何搞好，现在我们机关心中因为无数，希望各部队摸索总结一下经验，以便进一步来研究改进领航工作，加强领航训练，提高领航质量的问题。他们对空四军领航工作进行了吹捧。他说：四军对领航工作很重视抓的紧，你们召开了领航工作会议，四军的领航工作过去就有基础，总结了不少好经验，希望继续总结一些新经验。我说：欢迎他们到我们部队来检查、帮助、指导工作，请他们把在部队发现的问题及时告诉我们以便研究解决。我也谈了我们领航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后他们又到指挥室介绍了空二军所搞的自动标图领航仪的情况。在指挥所吃了午饭他们就回军部了。

以后。领航处、作战处先后和他们一起开座谈会时，他们就大肆吹捧林贼父子，为林贼父子等搞反革命阴谋大造舆论。领航处、作战处把和他们开座谈会的记录送给我看时，我才知道他们召开了座谈会（事先都未告诉我），看了他们的座谈会记录之后，我认为他们是乱说一气，有些问题是说过头了，提法上有问题的。比如把林贼父子吹捧为第三代的天才和接班人等（大致意思）。因此我认为作战处、领航处不应该召开这样的座谈会，让

他们这样乱谈问题，更不同意他们整理的座谈记录。为此我还批评林玉其和叶蜚闻不应该什么人来都搞座谈会，并指出了空司作战部来的领航参谋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有些问题的讲话是有问题的，作战处参谋常乃松来拿座谈会记录时，我也批评指出了这个问题。以后，胡寿昌又提出来要空司作战部来两个参谋，到参谋训练班去给讲讲路线斗争问题，我没有同意，我说不能让他们去讲。

空司作战部这两个参谋于一九七一年八月间从北京到东北又到上海，各部队到处开座谈会，竟敢这样大造反革命舆论，上面肯定是有人交待布置、有计划的搞的。

8. 一九七一年八、或九月（日期记不清了）一天，上海警备区司令部通信处通知军通信处裴寿生到他们那里去开会，研究解决警备区指挥所与军指挥所之间的通信联络线路问题。裴寿生把警备区要他去开通信工作会议的事告诉我之后，我就把裴寿生要去警备区通信处开会及研究的问题告诉了郑长华，并问郑对军指挥所与警备区指挥所之间在通信联络线路设备有什么要求。郑长华说：裴寿生去警备区通信处开会时，可以了解一下警备区指挥所的具体位置，以后有事时好联系。我就把郑长华要裴寿生去警备区通信处开会时了解一下警备区指挥所位置的事，告诉了裴寿生。而且我还告诉裴寿生，如果警备区的同志为了保密不便向你讲时，你就不要勉强的问了，不要让人家感到为难（当时我向裴也流露出一不完全同意他去开会时问警备区指挥所的位置）。

裴寿生就到警备区市内指挥所的位置开的会，会上警备区的同志也谈到了他们在郊区马鞍山的指挥所（过去都知道的）。这就是郑长华要裴寿生去警备区通信处开会时了解一下警备区指挥所位置的情况。我对了解警备区指挥所位置没有别的用意，也不了解郑长华要裴寿生去警备区通信处开会时了解一下警备区指挥所位置的别的用意目的是什么。■

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交

【执行反动组织路线】

执行林彪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

林彪反党集团为了控制空四军，把空四军变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反革命政变、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基地和依靠力量，在空四军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组织路线，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打击迫害革命同志，以执行他们的反动路线为标准选拔使用干部和组织黑骨干进行阴谋活动。我在军司令部具

（王维国像）体执行了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其财务罪行如下：

（一）在司令部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

1. 从一九七零年初开始，由于胡开德同志坚持正确贯彻执行了“四·二九”命令，坚持正确立场，对江腾蛟的错误罪行进行了批判；反对林立果抛出的黑文件和黑文件是“典范”的吹捧；抵制和反对王维国推行反动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采取的措施，因而使林彪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江腾蛟怀恨在心，认为胡开德同志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是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障碍。他们为了控制军司令部，为其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扫清道路，从一九七零年四月开始，就直接在军司令部组织进行罢胡开德同志的官、多军司令部的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一九七零年四月陈德福在常委会上提出要撤换姜国俊、程道芬同志的工作、整顿管理处、门诊部的问题之后，和我谈话时攻击胡副军长不同意整顿管理处、门诊部和撤换姜国俊、程道芬同志的工作，是他们的态度问题，“管理处、门诊部对路线斗争的态度问题根子在胡开德同志身上”，捏造和污蔑程道芬同志称胡副军长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要跟着红司令走，反映给胡副军长，胡副军长根本不批驳，以及胡副军长到处封官许愿，根本还

没有任命就在指挥所排出值班、写出职务，要罢胡副军长的官。并指出姜国俊同志和程道芬同志的工作，为在军司令部进行个不定期大造反革命舆论和进行准备。我当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错误的认为：“林彪接见王维国并赠送东西是对王维国的信任、支持和再次肯定，是对空四军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支持；王维国后边有林彪这个大靠山的支持，我跟王维国是不会错的。”于是我从思想上接受了他们对胡开德同志的污蔑攻击和个不定期的作法，并在军司令部积极推行了王维国罢官夺权的阴谋活动。

2. 为达到反革命罢官夺权的目的对胡开德同志进行打击迫害

(1) 一九七零年五月，在军党委扩大会议司令部小组会上开始进行罢官夺权，对胡开德同志打击迫害。会议前左平向我布置交待（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也在场）说：“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解决司令部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四.二九’以后在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的人要指名批评，指出其错误，要其进行检查；对当前司令部在路线斗争中存在的问题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找原因。你不要怕，要高姿态的进行检查，争取主动，主要是揭露胡开德同志在路线斗争中的错误。”我当时意识到这是拉我，也是对我的考验。

我召集参加会议的叶蜚闻、姜志华、周柞德、唐明智、裴寿生、梁金钟、李维勤等人研究确定在会上指名批评林之根、魏佐治、陈锦池、成关林，要其检查在“‘四.二九’以后在路线斗争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大家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判，组织大家准备揭发司令部在当前路线斗争中存在的问题，把斗争的方向引向了胡开德同志。军党委扩大会议司令部小组会就是按照以上事先组织策划的进行的。

我在会上污蔑攻击魏佐治，提拔是林之根同志，说：“你们根本没有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林之根同志不仅不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把自己说成是和正确的，这种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你明知方乾在‘四.二九’以后跳得很高，有严重的错误，而且组组上已经确定他要复员，为什么还要推荐方乾到通信营当营长呢？这不就是很大的错误么。”会上逼迫胡开德同志作了检查，这次会议不仅污蔑攻击、打击迫害了胡开德同志、林之根等同志，而更主要的是把“四.二九”以后在司令部出现的所谓路线斗争中的“错误”的原因和司令

部在当前路线斗争中存在的问题的原因——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都强加在胡开德同志身上，为进一步迫害胡开德同志、在司令部进行罢官夺权作了准备。指挥所我推行王维国罢官夺权阴谋活动制造出的恶果，我要负责。

（2）一九七零年七月，在军党委扩大会之前，王维国、郑长华都提出“胡开德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严重的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说飞行胡开德同志在‘四.二九’以后在司令部处以上干部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就是其证据（说胡开德同志攻击了江腾蛟）。”于是王维国、郑长华就操纵常委确定：“在这次军党委扩大会司令部小组会上继续对胡开德同志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接着，左平、梁金钟、李维勤、陈德福等，向我交待布置：“胡开德摘桃子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军常委确定在这次军党委扩大会司令部小组会上继续对胡开德同志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由你任小组长，胡开德同志已常委的名义分配到参加部队小组会，对胡开德同志的错误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以利于揭发问题。”

我召集参加会议的王恒阳、叶蜚闻、姜志华、周柞德、裴寿生、唐明智、梁金钟、李维勤等人做了布置，我说：“军常委确定在这次党委扩大会司令部小组会上，继续对胡开德同志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胡开德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我们和胡开德同志的斗争是路线上的斗争，在路线斗争上没有调和余地。我们要提高认识，与胡开德同志的错误划清界限，打击要带头揭发批判胡开德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态度明朗、旗帜鲜明，要敢于斗争，不讲情面，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对待胡开德同志的问题，这对大家也是一次实际路线斗争的考验。”并拿来李维勤抛出的所谓胡副军长在“四.二九”以后在司令部处的干部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材料给大家看了。

会议开始时，我也讲了以上内容的话，山东大家对胡开德同志进行攻击、打击迫害，以达到罢官夺权的目的。司令部小组对胡开德同志在政治路线上的严重错误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后，左平等立即出了会议简报，并组织策划政治部、后勤部小组给司令部小组写信不是坚持支持司令部小组对胡开德同志的斗争，并积极要求也要参与对胡开德同志的斗

争，以造成声势，进一步煽动对胡开德同志进行污蔑攻击、打击迫害。

胡开德同志要求直接参加司令部小组当面听取大家对他的意见后，左平等人害怕胡开德同志参加司令部小组会影响大家的“揭发批判”发言，担心“路线斗争的盖子揭不开”，而达不到预谋的目的，他们又组织梁金钟、李维勤亲自带头发言，抛出他们捏造的“胡开德同志严重路线错误的事实材料”，污蔑攻击胡开德同志欺骗煽动大家对胡开德同志进行污蔑攻击、打击迫害。会上我对权太万、王峰等人认为胡开德同志是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错误的发言进行了污蔑打击，我说：“把胡开德同志严重路线上的错误当成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错误是错误的，路线斗争是不能调和的。”这次会议句这样把制造“严重路线错误”的罪名强加在胡开德同志身上，逼迫其做了检查，最后我宣布胡开德同志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所作的检查未被通过，准备在今后继续检查。会后，王维国、郑长华又要胡开德同志继续检查自己的“错误”，已使胡开德同志靠边，实际上已罢了胡开德同志的官，夺了他在司令部的权。

当王维国污蔑胡开德同志“在政治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并接连组织对胡开德同志进行打击迫害时，我完全站在林彪及其死党王维国的反动立场上，认为胡开德同志要被他们打倒，排挤出空四军，我为了表示紧跟和效忠林彪机器上的王维国，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得到他们的提拔使用，使自己成为军司令部的“领导者”，及积极在司令部组织进行罢官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当林彪死党王维国要我组织在司令部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时，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信任，于是就卖力地为他们罢官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服务效劳而推行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控制了司令部的领导权。

(3) 一九七零年七月，司令部进行四好初评时，为了进一步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达到在司令部罢官夺权的目的，王维国操纵军常委确定：“要司令部以揭发批评胡开德同志的错误和管理处、门诊部的问题为内容进行四好初评，在梁金钟、李维勤直接参加下由我负责组织领导。”我按照王维国以上的黑决定，在七月份，司令部四好初评时，为了罢官夺权，又进一步组织对胡开德同志进行打击迫害，并采取了以下三个步骤：

①我在司令部四好初评动员会上煽动大家参加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进行罢官夺权的活动。我说：“林副主席接见王政委的一系列特大喜讯是对王政委的信任、支持和肯定，也是对我们空四军当前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支持。现在有的人企图控制我们空四军，使其脱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要坚决与这种行为进行斗争，我们空四军任何时候都要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有的人过去正确，现在不一定正确，有的人过去就是假左派、真右派，胡开德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我们和胡开德同志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次四好初评以揭发批判胡开德同志的错误和司令部在路线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为内容组织进行，大家要积极参加，在路线斗争中一定要站稳立场，态度明朗，旗帜鲜明，敢于揭发问题，这对每个人都是一次路线斗争的实际考验。”

②组织各处搞假材料，给胡开德同志制造罪名。为了搞假材料给胡开德同志制造错误事实，我曾多次召集小组长开会策划：要他们先摸底，找问题，组织有关人员一起回忆制造问题；组织查阅日记、会议记录搞假材料，对制造出的问题、搞的假材料，先在会上讲，然后写书面材料，最后又组织反复写和修改给胡副军长捏造错误事实的证明材料，直至达到制造错误事实的目的要求为止。例如XXX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提出“一次15师一个大队干部向胡副军长汇报时说飞行是技术不过硬，技术提高不快，主要原因是思想不过硬，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不好，说胡副军长讲你这样讲有什么用，能解决什么问题。”就捏造说成“胡副军长讲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污蔑胡副军长“反对毛泽东思想”。一支部有人歪曲原意的提出“在看电视节目时胡副军长讲他不爱看舞剧和京戏”，就捏造成胡副军长“污蔑攻击革命样板戏”；王恒阳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指出“他们在制定上海民兵建设规划部署时说，说胡副军长讲他们是纸上谈兵，瞎子点灯白费蜡”，就捏造胡副军长“反对毛主席民兵建设的指示”。我就是这样组织给胡副军长捏造了“反对毛泽东思想”、“污蔑攻击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污蔑攻击革命样板戏”、“反对毛主席指示”、“反对一打三反”、“单纯军事观点”、“使用干部和思想作风上的错误”等

内容的罪名，来恶毒的污蔑攻击、打击迫害胡副军长，以达到王维国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的罪恶目的。

③组织部党委扩大会直接对胡副军长进行污蔑攻击、打击迫害。我在司令部组织各小组捏造了胡副军长的错误事实材料之后，根据王维国的黑指示和展品、梁金钟、李维勤、陈德福的布置，召开部党委扩大会，首先抛出了我组织捏造的材料，从原来污蔑攻击胡副军长“对江腾蛟、林立果、王维国的态度问题”，无限上纲到污蔑攻击胡副军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指示”，跟恶毒的对胡副军长进行了打击迫害。然后我又组织策划在部党委扩大会上按捏造的内容问题，分题、定人，对胡副军长进行系统的污蔑、攻击，其具体组织是：周柞德打胡副军长的态度，王恒阳综合的发言，林玉其污蔑攻击胡副军长“反对毛泽东思想”。蒋国璋批判胡副军长对林立果黑文件的态度问题，还有叶蜚闻、廖振华、单清泉、宋国良、张敬发、唐明智、杨述桂等人，烦人不负责污蔑攻击胡副军长“污蔑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反对一打三反运动”、“污蔑革命样板戏”、“单纯军事观点”、“思想作风上的错误”等内容，来达到罢官夺权的反革命目的。

一九七零年八月上旬，四好初评之后，我召开司令部干部会讲了我在四好初评期间组织捏造的“胡副军长的错误”，污蔑攻击打击迫害了胡副军长，实际上是向司令部干部宣布罢了胡开德同志的官，夺了他在司令部的权。

一九七零年八月郑长华在他办公室向陈德福和我等人布置说：“由陈德福负责组织准备三大部的批判材料（给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分配对胡副军长的专题批判题目，指定发言人，审查批判材料）。”周宇驰来电话讲：“胡副军长对林立果、江腾蛟、王维国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但在批判胡副军长时不要提对林、江、王态度和林立果黑文件态度的内容，主要批判胡副军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所以这次三大部对胡副军长的批判就按周宇驰的意见来组织，把批判胡副军长对林、江、王态度的内容去掉，主要批判胡副军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于是

就把胡副军长当成“三反分子”来打击迫害。

④一九七零年九月，由郑长华布置、陈德福具体策划组织准备、由我主持会议、以司令部部党委扩大会的名义召开三大部干部会。在郑长华、姬应伍、魏忠锦、张启文等人亲自参加下，对胡开德同志进行了“专题批判”。在军机关范围对胡开德同志又进行了污蔑攻击、打击迫害。我在会上对肖舟同志的发言进行了污蔑攻击，我说“肖舟同志把胡开德同志的严重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说成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是错误的，是不能同意的”；郑长华、姬应伍都在会议作了表态性的发言。

一九七零年八月王维国组织召开军常委扩大会打击迫害胡副军长时，我按王维国事前的布置要求（会前王维国召集郑长华、李鸿均、陈德福和我等人到他家里布置要召开常委扩大会批判胡副军长，要陈德福给准备发言的材料，要我和李鸿均准备发言），我对胡副军长进行了污蔑攻击、打击迫害的发言，我无奈攻击胡副军长“犯了严重的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污蔑攻击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反对一打三反运动、反对革命样板戏、不突出政治、有单纯军事观点”，有错误。

一九七一年四月，我在军党委整风交心会上污蔑攻击胡副军长“在政治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没有检查认识错误，改变自己的立场、态度，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主要发展下去就是错上加错，是很危险的”，又一次打击迫害了胡副军长。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错误地批判郑刚副军长“对一系列特大喜讯的态度上有问题……知道现在没有检查认识过自己的错误，王政委几次找你谈话你都拒绝谈，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你对特大喜讯没有感情，对王政委不支持，而你对别的人（指周建平）却很亲近，感情很深，跟的很紧，无事不向其谈，这就是立场、态度问题”，对郑刚副

（周建平像）军长进行了打击迫害。

（5）一九七零年十、十一月间，根据王维国的黑指示我组织了司令部部党委把认为“有错误”的王峰同志排挤出部党委，让积极

行反动路线的叶蜚闻、唐明智、姜子华、裴寿生参加了部党委，组成了由杨忠立、裴斐、权太万、石冰、李维勤、王恒阳、叶蜚闻、裴寿生、姜子华、唐明智、胡开德参加的新部党委，军常委确定由我负责主持单位工作，完全夺了胡开德同志在司令部的领导权（王维国已要胡开德同志离开司令部到光福洞库机场建筑工地工作），司令部已成了积极执行反动路线、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服务效劳卖力的机关。一九七零年十月王维国召集郑长华、李鸿均和我（韩洪奎等人也在场）讲“要胡开德同志去光福工地负责修建工作，我是司令部的领导骨干，主持司令部工作，李鸿均是政治部的领导骨干，负责政治部的工作，以后按领导关系进行工作。”

3. 为罢官夺权而整顿管理处、门诊部，打击迫害姜国俊和程道芬

王维国认为管理处、门诊部是胡开德同志“控制”的，姜国俊、程道芬是跟胡开德同志的，为了罢官夺权的目的，他们首先在管理处、门诊部开刀，于是曾多次提出要撤换姜国俊、程道芬的工作，整顿这两个单位。一九七零年七月，在直接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进行罢官夺权的同时，王维国以常委工作组的名义，指派陈德祐任组长，武杠桥、徐菊才等人参加负责整顿门诊部，指派李维勤任组长，徐多义、施顺勤等人参加负责整顿管理处。他们打击迫害了姜国俊、程道芬等同志，夺了这两个单位的权，给胡开德同志制造了大量的罪名，打击迫害胡副军长，在司令部进行罢官夺权。

王维国打击迫害姜国俊同志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击迫害胡副军长，达到在司令部罢官夺权的目的，继陈德福在一九七零年四月污蔑攻击姜国俊同志“在路线斗争态度上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办事人的态度上有问题”，要撤换姜国俊同志的工作之后，在打击迫害胡副军长的同时，又以常委名义先后指派李维勤、梁金钟等人组织工作组进一步直接对姜国俊同志进行打击迫害，先给姜国俊同志捏造了“包庇污蔑攻击林彪的人”接着捏造姜国俊同志“贪污的错误”，陈德福根据王维国、郑长华的黑决定，把捏造姜国俊同志的“错误事实”报南空批准，对姜国俊同志进行“隔离审查”的打击迫害，其目的是要压迫姜国俊承认给他捏造的“错误事实”，以便给他“定罪”。由于姜国俊同志坚持正确立场，坚持原

则，没有屈服，于是又策划组织召开了司令部干部会对姜国俊同志进行了污蔑攻击、打击迫害后，送五七干校的、最后开除了姜国俊同志的党籍并做复员处理的意见。我除同意和支持王维国、工作组以上打击迫害姜国俊同志的策划做法以外，我还直接参与对姜国俊同志的打击迫害，给姜国俊同志谈话迫使他“交待揭发问题”，梁金钟要我给姜国俊谈话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主持司令部干部会对姜国俊同志进行污蔑攻击、打击迫害，主持司令部党委会讨论对姜国俊同志的处理意见（没有做出处理决定）

4. 打击迫害排挤各处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由王维国的黑骨干控制各处的领导权。

一九七零年七月以后，在打击迫害胡副军长，在司令部进行罢官夺权的同时，王维国通过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等人具体提名，由干部处安排，我具有组织实施，先后把坚持正确路线的指挥所杨宝泉同志、通信处林之根同志、机要处张志芬同志、管理处姜国俊同志、门诊部程道芬同志、科研处刘吉贤同志等领导干部，加以污蔑攻击、打击迫害后（具体登记迫害后面交待）排挤出司令部。提拔、配备王维国的黑骨干占据了各处的领导岗位。各处的领导权就完全由积极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的黑骨干所控制。指挥所王维国在司令部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在处一级组织上采取的黑措施和步骤，是我贯彻执行的。

5. 通过改选支部，由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的黑骨干控制了各支部的领导权。

一九七零年七月司令部四好初评之后，我布置各支部普遍进行了改选，各支部的正副书记都是我指定的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的黑骨干担任的（一支部是姜志华、杨述桂，二支部是王恒阳，三支部是唐明智，四支部是李胜良），支委也是我确定或同意的，使各支部的领导权也完全由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的黑骨干所控制。这是我组织罢官夺权、推行王维国反动路线在组织上采取的黑措施。

由于我按照林彪死党王维国并通过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等人的策划布置，在军司令部积极组织反革命罢官夺权的结果，打击迫害、排挤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

志，使司令部完全由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的黑骨干所控制，把司令部变成推行林彪及其死党王维国反动路线的机关和工具，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了干部，我要负主要责任，是我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二）打击迫害干部

为了在司令部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控制司令部、推行林彪及其死党王维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在司令部执行了王维国“亲不亲，线上分”、“以我划线排队”的反动组织路线，对认为是在林彪、王维国黑线上的干部就提拔重用，对认为不是或反对这条黑线的干部则一律采取了打击迫害和排挤。我按王维国及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等人的策划、布置，在司令部直接、间接的打击迫害和排挤了十七名罪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原则的干部，其情况如下：

1. 我直接参与打击迫害的干部有十一名，除打击迫害胡副军长和姜国俊同志外，还打击迫害了以下同志：

（1）打击迫害石冰同志。一九七零年我污蔑攻击石冰同志“对特大喜讯的态度和王维国的态度是形左实右，是别有用心的，是错误的；对胡开德同志态度暧昧，不揭发问题；工作上干劲不足，思想作风上有错误。”一九七零年三月份我曾表示不同意提石冰同志任副参谋长。一九七零年七月在打击迫害胡副军长时和一九七一年四月整风时，我组织对石冰同志也进行了污蔑攻击，逼迫石冰同志作了检查。

（2）打击迫害王峰同志。一九七零年七月，在打击迫害胡副军长时我污蔑攻击王峰同志“对胡开德同志的问题态度不明朗”，并根据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抛出的污蔑攻击王峰同志“在‘四·二九’以后犯有错误的材料”，要其在一九七一年四月部党委整风会上作了检查，我按王维国的意见，在改组部党委时把王峰同志排挤出了部党委。

（3）打击迫害杨宝泉同志。一九七零年七月，由于杨宝泉同志坚持正确立场，对带迫害胡副军长有不同看法，我找杨宝泉同志谈话，污蔑攻击他的“认识和态度是错误的”，我污蔑攻击胡副军长“在政治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杨宝泉同志仍然坚持正确的立场，

不同意我对胡副军长的污蔑攻击和打击迫害。因此我向姜志华、叶蜚闻布置要他们召开支委扩大会对杨宝泉同志进行污蔑攻击、打击迫害后，送“五七干校”的。

(4) 打击迫害林之根同志。我同意支持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污蔑攻击林之根同志“在‘四.二九’以后犯了错误，他是跟胡副军长的”，并在一九七零年五月，在军党委扩大会司令部小组会上，对林之根同志进行打击迫害之后，排挤出司令部去搞支左工作。

(5) 打击迫害张志芬同志。一九七零年由于张志芬同志坚持原则，说不能称林立果的作战文件是典范（传达空军机要局的意见），因此，我污蔑攻击张志芬“是对林立果的态度问题”，并要唐明智在机要处组织对张志芬同志进行了污蔑攻击、打击迫害，然后把张志芬同志排挤出司令部，去搞支左工作。

(3) 打击迫害方乾、樊松林、李伯成同志。由于他们在“四.二九”以后坚持了正确立场，批判了江腾蛟的错误罪行，因此反说他们“在‘四.二九’以后犯了错误”，打击迫害他们；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樊松林复员，以后因方乾同志的家在江苏省连云港，王维国怕他“被南京大军区拉过去”，又不准复员，以后才送到“五七干校”；因要彻底改组通信处，而把李伯成同志排挤出司令部，分配到部队工作。

(7) 打击迫害李先同志。王维国及左平、陈德福、梁金钟等人污蔑李先同志在公检法军管会工作时“私拆王维国的机密亲收信件，搞两派，犯了严重错误，性质恶劣”（具体情况不了解），因此被打击迫害、排挤出军管会。一九七零年四月，我按王维国及左平、梁金钟、陈德福的策划、布置，并直接指派李松亭、江金龙等人参加下，我组织司令部处以上干部会，对李先同志进行了污蔑攻击，打击迫害，并要其写了检查材料。

2. 我同意和支持王维国指派的工作组在整顿管理处、门诊部时，对程道芬等六名干部的打击迫害处理，其中把程道芬、张医生、杨医生排挤出门诊部，调到部队工作，把祝医生、护士长和管理处行政助理员做复员处理。

3. 我对直属党委的一些干部甚至战士也进行打击迫害和排挤，我在直属党委会上曾提

出要调换战勤连的连长、指导员，认为连长是跟胡副军长的，政指是警备区副主任的女婿，放在战勤连工作不合适。杜贵珍告诉我“原巨鹿路招待所协理员的家在苏州地区，其爱人参加了本地区一个单位的革委会，因此，在巨鹿路招待所工作不适合”，要我调换；我告诉潘玉昆把该协理员调到部队工作，另换了协理员。对通信营的肖进（张春桥同志的女儿）和陈士法、张宜爱同志的女儿，也采取了排挤的错误做法，因为王维国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反对张春桥同志和南京大军区，我认为他们在通信营工作不适合，我曾提出送她们读大学，没有实现，以后又确定送陈士法、张宜爱同志的女儿进空军通信技术训练班，目的都要把她们排挤出通信营。王维国为打击迫害肖进同志所采取的黑措施，都是直接向裴寿生布置交待的，有时裴寿生告诉我，我也是同意的，要他按王维国的黑指示办。

（三）以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为标准选拔使用干部

一九七零年四月，王维国在军常委会上讲：“选拔使用干部首先要从路线上考虑，我们在选拔使用干部上存在的问题，就是没有注意和重视路线问题。”王维国及其控制的干部处选拔使用干部都是以对林贼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的态度、执行反动路线为标准进行的。凡是积极吹捧他们、执行其反动路线的就成为其黑骨干，被提拔使用，我在司令部也是这样贯彻执行的。

1. 我在司令部推荐、选拔、使用了十五名积极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积极吹捧他们、积极参与打击迫害胡副军长等人进行罢官夺权、听话、使用顺手的黑骨干到处一级的领导岗位，控制了各处的领导权，来推行林彪、王维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被提拔使用的黑骨干是：周柞德、裴寿生、王辉章、江金龙、朱清来、廖振华、石志远、从玉林、唐明智（上面未批准）。

2. 我也同意王维国通过干部处直接在司令部提拔使用的十三名黑骨干，他们是：施唯清、杨以臣、林承莹、过全、蒋国璋、吴振龙、王伏峰、吴小景、卢德贤、王秀芬、范瑞娟、周丽娟、权诗友。

3. 我也同意王维国为了控制司令部推行其反动路线向司令部调配的十一名黑骨干，他

们是：裴斐、李胜良、武杠桥、孙秉才（没有到任）、刘厚武、杨如山、杜贵志、王明吉、于方盛、陈吾兴、卢慕玲（未到任）。

（四）组织黑骨干控制司令部，推行王维国的反动路线

1. 王维国为了控制司令部，推行其反动路线，一直在司令部发展组织黑骨干，参加王维国组织的黑骨干会的人员都是王维国直接确定（通过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等人），参加王维国组织的黑骨干会活动，也是由王维国直接确定通知的。参加王维国组织召开的黑骨干会，就成为王维国直接掌握的黑骨干，王维国在司令部直接搞掌握的黑骨干有：梁金钟、李维勤（开始就是他们两人）、杨忠立、裴斐、权太万、叶蜚闻、唐明智、王恒阳、姜志华、李胜良、武杠桥、吴振龙、张敬发、江金龙、林玉其、廖振华、胡燕斌、梁培凯、王辉章、杨运辉、刘厚武、王秀芬、范瑞娟、周丽娟、裴寿生等。

2. 我和裴斐、梁金钟（参加司令部黑骨干会的人都是我们一起研究确定的）为了传达和贯彻王维国的黑指示，了解掌握各单位的情况，推行王维国的反动路线，从一九七一年初开始，也模仿王维国的做法，在司令部组织了黑骨干，除了以上王维国在司令部直接组织掌握的黑骨干以外，我们又把积极执行王维国反动路线、积极吹捧他们、积极参与打击迫害胡副军长等人进行罢官夺权的人和王维国调配到司令部来的人，作为司令部的黑骨干。他们是：周柞德、杨述桂、柳振民、朱清来、袁成俊、单清泉、戴洪学、江耀生、杨如山、胡寿昌、于方盛、王明吉、杜贵志、陈吾兴等人；加上王维国在司令部直接组织掌握的黑骨干就是司令部全部的黑骨干。确定参加黑骨干会的人就成为黑骨干。

为培养黑骨干我们还有意识的让一些人参加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进行罢官夺权的会议、交待任务指定其发言进行锻炼，有的派去招待北京来的黑骨干进行培养（如戴洪学就是这样）。

司令部黑骨干由以下几种人组成：王维国直接在司令部组织掌握的黑骨干；各处的领导干部；王维国调配到司令部的干部；还有少数的参谋和门诊部的干部。确定参加黑骨干会的人就成为黑骨干，发展黑骨干再没有采取别的方式。

司令部黑骨干的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参加王维国组织召开的黑骨干会，组织进行讨论（内容同参加黑会活动的材料）；二是司令部召开黑骨干会传达贯彻王维国等人的黑指示，我在司令部共召开过四次黑骨干会，传达林彪死党周宇驰、王维国和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指示（内容同我主持召开黑骨干会活动的材料）。

（五）对这些王维国反动组织路线的错误、罪行的认识

林彪死党王维国为了推行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在组织上推行了一条反动组织路线，在军司令部组织进行反革命罢官夺权、打击迫害、排挤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对干部进行腐蚀、拉拢，培植他们反革命的亲信，以对他们的态度、执行其反动路线为标准，“任人唯亲”的提拔使用黑骨干；组织黑骨干控制司令部，完全是为了在组织上保证推行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罪恶目的。

我在司令部积极执行和推行了王维国的反动组织路线，组织进行了反革命罢官夺权、打击迫害、排挤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以对王维国等人的态度、执行其反动路线为标准推荐、选拔、使用黑骨干，控制各处的领导权，组织黑骨干控制司令部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把军司令部变成了推行王维国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机关和工具，毒害了大批干部，完全适应了林彪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这完全是我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为林彪反党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服务、效劳、卖力的恶果，是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下的严重罪行。■

【执行反动组织路线】

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问题

（一）打击、迫害好同志

林贼死党王维国为贯彻其黑主子的反革命旨意起见，在对他们推行的反动路线表示不同意见，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或认为对他们“不好”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戴上“执行错误路线”、“是政治、路线上的严重错误”、“是对林贼及其死党的态度问题”等大帽子，而加以斗争、批判，进行打击、迫害。打击、迫害好同志是林贼死党王维国直接和左平、徐光辉、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策划组织的。他们控制掌握了所谓“党委掌握动态办公室”，搞推行反动路线、打击、迫害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勾当。在司令部我参与和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等打击、迫害好同志的错误活动。

1. 打击、迫害李先同志

李先同志于一九六七年底就离开司令部到公检法参加军管会工作，从未听他讲犯有什么错误。一九七零年四月间，陈德福在一次党委常委会上突然提出李先同志在公检法军管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性质很恶劣”（还讲了很多所谓错误事实），并建议党委要对李先同志的“错误”进行适当处理。以后梁金钟有找我谈李先同志“错误”的问题，他首先问我敢不敢对李先同志的“错误”组织批判，我说：这不是敢不敢对李先组织批判的问题，李先同志已离开司令部到公检法搞军管两三年了，他有什么错误问题，司令部的人也吧了解，怎么组织批判呢？李先既然是军管会工作时期发生的问题，犯的错误，那就应该在军管会解决。梁金钟说：李先还是司令部的人，现已由军管会回司令部了，还是在司令部积极李先的问题。我说：李先应该不应该批判我不能决定，要由军常委讨论才行。不久，他们谈过军常委决定由司令部组织对李先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批判，于是我就参与了丢李先同志的打击迫害。由我主持处的干部会，在梁金钟、李维勤亲自参加下，并由左平、梁金钟等人指派支左办公室的蒋金龙、军管的李松亭等人参加下，主要由他们揭发问题，对李先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一次揭发批判，李先同志在会上作了检查。以后，林贼死党王维国及左平等人又要李先同志回军管会，参加军管会党委解决他的问题的会议；军管会开完会，李先同志就正式离开军管会回司令部休息了。李先同志回司令部后，在一段较长的时

间内，左平、梁金钟曾几次向我提出要在司令部继续组织对李先同志继续批判，不能让他这样呆着。我说继续组织批判也不会有结果的。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继续对李先同志继续批判。后来李先同志找我谈要求工作，并谈了他在思想、工作作风一些问题上的认识，我认为他对自己的问题在认识上有进步，要求他写一份检查材料，以便好向王维国等军的领导建议分配他的工作。路线检查材料写好后，我曾向林贼死党王维国以及郑长华、姬应伍几次提出建议说：李先对自己的问题有所认识，我认为主要是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对他的问题由不能做其它的结论，应该分配工作。他们口头上也说是应该分配工作，但一直都没有分配工作。

以上就是我参与打击迫害李先同志的情况。至于林贼死党王维国等为什么要打击迫害李先同志，并不要他参加军管会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原因我也不清楚。

2. 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

打击迫害的起因：（1）林贼死党王维国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就开始对司令部感到不满而要下手整顿，首先表现在不知什么原因他对门诊部的领导程道芬大为不满，他不通过司令部的党委主要领导人胡开德同志，而直接给武军同志交待任务，要他组织工作组整顿门诊部（武军光说王要他带几个人整顿门诊部，为什么要整顿、如何整顿、解决什么问题以及整顿的情况都未向司令部党委和领导讲）。武军整顿门诊部一开始不问情况如何就把主要矛盾指向了程道芳，并动员说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来揭发门诊部领导的问题，当时对这样的整顿反映意见很大，说是有意打击人而不是整顿。由于胡开德同志和我当时也不赞同这样整顿法，故使他们这次对门诊部的整顿没有达到预期，他们认为门诊部的问题也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解决。因此对门诊部的程道芬就更为不满。

接着林贼死党王维国和裘著显、蒋国璋等人又籍制造发生的几件事大做文章，大造舆论，为进一步打击迫害好同志、控制司令部做准备。一次是说，借邱会作老婆（由北京来上海）的小车排将该女人送到某处时，在门口停车，未将车开进院内，而让邱的老婆下车走进去的，并说司机在门口有意按汽车喇叭催邱的老婆走，使邱的老婆大为不满；一次是说林贼

秘书由军部回巨鹿路招待所时蒋国璋向小车排要车送时，小车排先没有派车，以后派车送到南京路，秘书到百货公司买东西，司机没有在那里等，就把车开回军部了，使该秘书很有感觉；一次是说，蒋国璋要给自己开的汽车换车牌，小车排未立即给他换，使他大为不满；还有管理处、门诊部其他一些他们认为不满意的事。林贼死党王维国等人就把以上这些所谓问题说成是“路线斗争问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办事人的态度问题”，“是司令部路线斗争观念不强、路线斗争教育放松了的表现”等。对司令部进行多次严厉的批评指责，要求进行严肃处理，并不断施加压力，我当时做了检查，承认了林贼死党王维国批评指出的问题。但他们对司令部这些问题仍然抓住不放，提出来要调换姜国俊同志和程道芬同志的工作并要对管理处、门诊部进行整顿。由于胡开德同志不接受他们批评指责和提出的意见，并在以后常委讨论干部问题时对有的干部使用上没有同意和支持林贼死党王维国的意见，而使林贼死党王维国等人怀恨在心，就开始对胡开德同志进一步进行打击迫害。

（2）一九七零年三、四月，陈德福先在常委会上提出了管理门诊部的问题，要调换姜国俊、程道芬同志的工作，要对这两个单位进行整顿。因常委认识不一致没有正式作出决定。陈德福和胡开德同志个别交换意见也没有结果。陈德福又找我个别谈，他讲了一些对胡开德同志的意见，整顿门诊部和管理处，提出要调换姜国俊、程道芬的工作，并提名孙秉才、李胜良任管理处的正副处长。我当时表示同意，请军常委研究确定好了。

（3）一九七零年五月份，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司令部参加会议的副处长以上的干部编为一个小组，由胡开德人组长，我人副组长，左平、梁金钟、李维勤、陈德福、徐光辉在林贼死党王维国的授意下，阴谋策划组织并在梁金钟、李维勤亲自参加下，对他们认为在“杨、余、傅”反革命事件被揭发后“犯有错误的人”：林子根、魏佐之、陈敬池、成关林进行点名批评，要带头检讨（都是梁金钟、李维勤事先准备提出的，“杨、余、傅”反革命事件揭发时我正在越南，故对当时情况不了解）。并动员揭发司令部在路线斗争中和领导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要揭发王维国等人任务当时司令部存在的问题）。左平、

梁金钟等人要我在小组会上进行高姿态的检查，以便争取主动。组织发动揭发司令部存在问题之后，当时带着的矛头是针对胡开德同志的，但还不是那么公开、露骨就是了。在这次军党委扩大会议司令部小组会上被点名批评的人都作了检查发言之后，额和胡开德都做了检查，就结束了会议。



（4）一九七零年七月份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时，林贼死党王维国又提出胡开德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严重的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说已发现胡开德同志在“四·二九”后在司令部处以上干部讨论会上的发言有严重的错误。郑长华看了胡开德同志在司令部处以上干部会上的发言记录以后，也完全同意王维国的意见，任务胡开德同志是路线上的严重错误。于是王维国、郑长华通过常委确定在这次军党委扩大会议司令部小组继续对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揭（郑长华像）发批判。左平、梁金钟、李维勤、陈德福、徐光辉以怀疑秘书组（也是军常委掌握动态办公室）名义进行了具体策划：以军常委的名义把胡开德同志分配到别的小组，要我当司令部小组的组长。在梁金钟、李维勤的亲自参加下，我对胡开德同志的错误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怀疑开始后，司令部小组一提出继续揭发、批判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时，他们就立即写了会议简报，在他们的直接策划组织下，政治部小组、后勤部小组立即写信给司令部小组表示支持和积极参加对胡开德同志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以造声势。在这种情况下胡开德同志要求直接参加司令部小组听取大家对他的意见。郑长华等就同意胡开德同志参加司令部小组会，左平、梁金钟、李维勤、陈德福等人就亲自带头发言，揭发他们掌握的所谓胡开德同志的严重错误事实材料，从此以后就把胡开德同志作为犯了政治路线错误的人来揭发批判进行打击迫害。从此以后我问起站到林贼死党王维国的反动立场上，执行了队胡开德同志的打击迫害。

（5）一九七零年七月军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林贼死党王维国一面亲自组织陈德福、韩洪奎、叶蜚闻、郭兆理在 200 号整理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材料上报，又召开军常委扩大会议

（各部的领导干部参加）对胡开德同志等的所谓错误进行批判，或根据大家揭发所谓胡开德同志的错误材料对胡开德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打击的发言。王维国在会上发言，恶毒地污蔑胡开德同志说：“胡开德同志的思想已经发霉、变修，错误十分严重”等。

（6）一九七零年七月份司令部进行上半年四好初评时，王维国和郑长华确定以常委名义要司令部以揭发批判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和管理处、门诊部的问题为内容进行四好初评。在梁金钟、李维勤和亲自参加下要我组织领导司令部的四好初评。我在司令部组织动员普遍对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揭发，我主持司令部党委扩大会，对胡开德同志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最后我向司令部的人员讲了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的问题。

（7）一九七零年八月份郑长华制定陈德福为组长，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与胡开德同志核对（就是要其承认）错误事实。接着根据林贼死党吴法宪对王维国上报的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事实材料的批语（批语的大意是这样高级的干部有这样严重的反动言论是不允许的，要对其反动言论组织批判）。郑长华又指定陈德福负责组织死不了、政治部、后勤部对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处理准备（组织些批判处理并审查定稿）。九月上旬，郑长华、姬应伍确定以司令部党委扩大会的名义，由政治部、后勤部派人参加（实际上是三大部的批判会），由我支持，郑长华、姬应伍、张启文、魏忠锦、胡锦生等与部的领导干部都参加。接下来陈德福负责组织批判发言内容，材料对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又进行了一次批判。会上郑长华、姬应伍做了发言，表了态；我对肖舟同志的发言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攻击，认为他是在为胡开德同志的错误进行辩护，把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说成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我是林贼死党王维国打击迫害胡开德同志的积极参加者，同时我也批评了肖舟同志，是我的严重错误。

（8）一九七零年十月份改组部党委

3. 打击迫害姜国俊同志及对管理处的整顿

打击迫害姜国俊同志及对管理处的整顿是由林贼死党王维国直接掌握、由左平、梁金钟、李维勤、陈德福等人组织策划进行的。他们是以军党委工作组的名义，直接指派李维勤、

梁金钟负责（李因病住院后由梁负责）、徐多义、施维勤等人参加下（当时“一打三反办公室”重点也放在管理处）对管理处进行整顿、打击、迫害姜国俊同志的。整顿方案由他们提出，先批准后经常委同意，由他们具体组织实施的。对姜国俊同志的打击迫害我虽然没有负责领导、具体组织进行，但我也是参与了的，我是同意管理处整顿的，我曾找姜国俊同志谈过话，要他交待揭发问题；徐多义等搞出讲管理处生产组会计沙为良揭发姜国俊贪污生产费 800 多元（是张会计从他的贪污额中分给姜的），为了澄清张会计揭发姜国俊贪污问题是否属实，我曾找张会计谈过一次话：要他不要怕，要实事求是的交待揭发问题，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使他讲姜国俊贪污问题（有无逼供的问题）。他讲姜国俊贪污问题如是说错了，不是事实，是假的，允许他纠正，完全可以推翻，组织上保证不会责怪他；如果讲的姜国俊贪污是假的专机又不纠正，那就是有意陷害人，就是罪上加罪，自己要负完全责任。张会计表示说：“他讲的姜国俊贪污问题完全属实不是假的。”

陈德福根据王维国、郑长华等人的意见故经南空批准要把姜国俊进行隔离审查交待问题时，要我给姜国俊谈的话。一九七零年十月梁金钟负责领导的工作组组织对姜国俊的所谓错误批判时是要我主持的。对姜国俊隔离审查三个多月之后是我建议解除到五七干校学习的。一九七一年春夏之际梁金钟负责组织整理的关于姜国俊错误问题的材料及其处理意见，曾两次提交司令部党委讨论过，他们提的处理意见是转业、开除党籍。两次讨论都仅作了一些酝酿议论，因感到有些问题还未弄清，对姜国俊贪污问题是提到有人揭发其贪污，没有做出结论，因此司令部党委没有做出决定，也没有提交军党委讨论，就这样拖下来了。以上就是我参与打击迫害姜国俊的情况。

4. 打击迫害程道芬同志和整顿门诊部

整顿门诊部、打击迫害程道芬同志同样是由王维国亲自掌握，以党委工作组的名义直接指定陈德福（梁金钟负责由武杠桥、徐菊才等人参加下进行整顿的），整顿门诊部、打击迫害程道芬同志我虽然负责领导，没有具体参加、组织进行）但对门诊部的整顿、对程道芬等人的批判我也是同意的。他们知道完之后对程道芬和张医生等人调离工作的处理和调

整组织提交配备干部问题已实现经过王维国做出决定，然后由梁金钟向部党委提出讨论，形式上我和部党委也是同意的。

5. 对认为“有错误的人”的批判

林贼死党王维国及其左平、陈德福、梁金钟、李维勤、徐光辉任务“有错误的人”（与他们已经不同的人），他们都指名指出来要在司令部组织进行批判。我执行情况如下：

（1）他们认为杨宝泉同志对胡开德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态度不明朗，认识上有错误，并提出地方揭发上说他有严重的错误，要在司令部组织批判，要一支部开支委扩大会对杨宝泉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批判。杨宝泉同志作了检查。

（2）他们认为张志芳同志对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黑文件的态度有错误（王维国发电报给空军党委，吹捧林贼之子林立果的黑文件为学习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典范之后，张志芳同志曾转达空军机要局的意见，说不能提林立果写的作战文件是学习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典范）等要组织批判。我当时认为说不能提典范是不对的，但并不是张志芳本人的认识意见，而是转达空司的意见，所以我没有组织对张志芳进行批判。张志芳同志在他们处的小组会上自己检查了一下。

（3）他们说成兰林同志在“四·二九”“杨、余、傅”反革命事件揭发后在司令部处以上干部讨论会上有攻击江腾蛟的言论，要组织批判。因我不了解情况，我没有组织对成兰林的批判，而是要提醒他在适当会议上检查认识一下。成兰林同志在一九七一年四月部党委交心会上主动做了检查发言，其他同志也没有对成兰林同志提出批评。任务成兰林同志认识到了自己的所谓错误，因此我在部党委会上曾提议提成兰林人侦查处的处长，部党委一致同意后并上报了军党委和干部处。

（4）他们说后勤部揭发王峰在“杨、余、傅”反革命事件揭发后讲了不少错误言论，要司令部对王峰的错误组织批判，因王峰同志长时间在军后勤帮助工作，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才到航办工作，为司令部领导，我因为不了解王峰同志所谓错误的情况，我没有在司令部组织对王峰同志进行批判，以后我向他们（左、陈、梁、李、徐）把所谓揭发的王峰错

误材料要来，交给王峰同志，我对王峰同志说：你看那些问题是你讲过的，你有什么错误就实事求是的在适当的会议上主动检查认识一下。王峰同志在一九七一年四月部党委整风交心会自我检查认识一下。我向王维国、郑长华等都反映过，我说：王峰同志对过去的一些错误主动在部党委整风交心会作了检查，认识和态度还好。王维国说：那就可以继续上报要他任副参谋长。

（5）对认为“有错误的人”的处理

林贼死党王维国及其左平、陈德福、梁金钟、可我却等人对认为“有错误的人”提出的处理意见我也是同意的，按照这些的。其具体情况是：

调离机关到部队工作的有张志芳、程道芬、张医生等；

调离机关去支左

调“五.七干校”学习的有杨宝泉；

复员处理的有原警卫排长、原门诊部护士长杨瑞娟和一个医生；

（二）以执行林贼反动路线为标准选拔干部

林贼死党王维国及其控制的干部处，选拔配备使用干部都是以对林贼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的态度、执行其反动路线为标准进行的。凡是积极吹捧他们、执行头脑黑反动路线的他们就认为是“好干部”，就要提拔重用，我在司令部也是这样执行的。

1. 林贼死党王维国为了控制司令部为他们反动路线服务，向司令部调配的干部有：裴斐、李胜良、蒋国璋、武杠桥、孙秉才、过全、杨如山、吴振龙、刘厚武、警卫排的副政指（北京派来的）和管理处的两个副处长（原军教导队的王副队长、虹桥场站的于副参谋长）、军指挥所的所长等（等人执行都是王维国和干部处认为“是可以信任的好干部”选调来的，但并不是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坏的）。

2. 林贼死党王维国在司令部直接提拔使用的亲信干部有：吴振龙、施维勤、杨以臣、林承莹、王伏峰、张兆玺的老婆（门诊部助理未到职），他的警卫员小吴，警卫连副连长、蒋国璋、廖振华、过全、机务处的陆德贤、门诊部的王秀芬、范瑞娟、小周。以上都是王

维国和干部处决定后告诉我的，我也表示同意的。

3. 司令部党委讨论推荐经王维国、军常委同意提拔使用的干部有：张秉功、单清泉、吴启炎、周柞德、裴寿生、王辉章、蒋金龙、林玉其、林振民、李文斌、杨述桂、袁成俊、杨运辉、朱清来、张敬发、成兰林、廖振华、从玉林。

（三）关于组织使用黑骨干的问题

1. 林贼死党王维国为了控制军机关各部组织黑骨干以便推行他的反动路线，王维国组织的黑骨干都是由其亲信（五人小组）提出，由王维国亲自审查确定的。参加王维国组织的黑骨干会及其他活动的，范围、人员名单都是由王维国及其亲信确定、通知的，部里是无权决定的。在司令部作为王维国直接确定组织的黑骨干有：梁金钟、李维勤（开始就是他们两人）、裴斐、权太万、杨忠立、叶蜚闻、裴寿生、唐明智、姜子华（以后不是了）、王恒阳、张敬发、林玉其、廖振华、胡燕斌、李胜良、吴振龙、武杠桥、杨运辉（后期）、王辉章等。

王维国组织黑骨干会议的活动也就是我前面交待的那些黑骨干会议情况（仅我了解的）也不是每次黑骨干会所有的黑骨干都参加了，参加的人员的名单和范围均是他们所决定的。

2. 司令部为了传达和贯彻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的黑指示和了解掌握各处的情况、推行反动路线，基本上把各处的领导干部都作为黑骨干使用的。也有少数参谋和其人员为黑骨干，他们是（王维国组织确定的黑骨干，也是司令部的黑骨干）杨述桂、柳振民、朱清来、袁成俊、周柞德、戴洪学、招待所江耀生、刘厚武、王秀芬、曹雪琴等人。

司令部黑骨干的活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参加了王维国组织召开的黑骨干会后组织进行讨论贯彻执行（在前后参加黑骨干会活动问题已交代了，故略）；一方面是司令部召开黑骨干会传达林贼父子及其死党王维国等人的黑指示。我在司令部召开过四次黑骨干会传达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林贼死党周宇驰和王维国的黑指示（前后在我主持召开司令部黑骨干会的活动已写了，故略）。我没有组织别的活动。梁金钟、裴斐可能还组织司令部黑骨干进行过活动。

（四）对于执行林贼死党王维国反动组织路线的错误罪行的认识

林贼死党王维国为了执行林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在组织上推行了一条反动的组织路线，为贯彻其反革命的旨意期间按，他们打击迫害对他们反动路线怀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好同志；不问情况如何，不择手段的一律戴上“执行错误路线”、“犯了严重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等罪名，进行批判、斗争、打击、迫害，以致其死地而后快。任人唯亲、欺骗、拉拢腐蚀干部，培植他们的亲信，以对他们的态度、执行他们的反动路线为标准，提拔、配备、使用干部，组织黑骨干控制机构部队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完全是在组织上保证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服务的，是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组织部分和严重罪行。他们的组织路线就是逆我者亡，顺我者昌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我在司令部执行了林贼死党王维国推行的反动组织路线，参与了打击迫害好同志，同意他们对干部的提拔配备使用决定；按他们的标准选拔、配备使用干部，组织黑骨干活动，贯彻执行其黑指示，这完全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推行了反动的组织路线，为在组织上保证贯彻执行林贼及其死党王维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适应其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而服务效劳的，是自己执行反动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政治路线上犯下的严重错误罪行。■

【执行反动组织路线】

干部初评

一九七零年八月上旬，我在司令部干部会上总结四好初评时，讲了四个问题：

1. 司令部的形势，主要讲四好初评情况和四好单位情况；
2. 胡开德同志的“错误”；

3. 教训：

（1）“任何时候都要坚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就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正确立场，使自己不犯错误；有的人为什么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坚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过去是正确的现在不一定正确，过去是左派现在可能是右派。正确与错误、左派与右派都是可能变化的，关键在于是否坚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接受教训，坚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会犯错误。”

（2）“正确地识别领导、选择干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为了不跟错人，不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不犯错误，就要正确识别领导，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就是好领导，就要紧跟，否则就是错误领导，跟着错误领导就要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犯错误。对错误领导不仅不能跟，而且要抵制、反对。究竟是正确领导还是错误领导，要看他执行什么路线，而不是看表面他的职位高低和资历长短，要在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就要正确地识别领导，对下就是正确的选择使用干部，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3）“要明确对待林副部长的态度就是对待林副主席、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认识、对待呢？因为林副部长给我们及时传达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所以我认为林副部长对我们的指示不仅代表他个人，也代表了林副主席；对待林副部长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空军常委决定“、‘一切听从林副部长指挥，一切听从林副部长调动’，我认为也是这样，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对待。”

（4）“现在有的人不敢直接反对毛主席，而反对坚决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副主席，妄图达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目的。因此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们就要打倒谁；谁反对林副部长我们就要和谁斗。在我们司令部不允许有反对林副部长的人存在。”

4. 今后怎么办■

【整风】

七一年二月司令部整风时我和杨运辉个别谈话情况

经过我反复回忆我和杨运辉谈话情况如下：

一九七一年二月份，司令部在整风发扬民主时，各处向司令部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为使各处的领导干部把对部里的意见都讲出来，部里又分别找处长们个别谈心征求意见。我和杨运辉是在党委会议室谈的。

我说：过去和你们谈的不多，今天主要是征求对我的意见，你对部党委的领导和我个人有什么感觉、意见可以谈谈。你在处里当着参谋人员，可能对部的有些意见感到不大好讲，今天你有什么感觉、意见都可能提，提意见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我们今后好改进。杨运辉说：我感觉你过去参加训练处工作和学习活动少，平时和大家接触的也少，这可能和你们的业务分工有关系，希望今后多参加训练处的一些活动，以便了解情况，进行帮助；你过去很少和我们个别谈，对我们的思想情况的了解也不够，希望今后多和我们个别谈谈，进行帮助，及时提醒，多打招呼，免得我们犯错误；过去部里召开一些会议（指王维国召开的黑骨干会）我没有参加，思想上有些感觉不是个滋味，认为部的领导对我另有看法，不很信任（杨运辉还谈了对其他人的一些感觉）。

杨运辉讲完意见之后我接着说：你把意见都讲出来，这很好。过去我参加你们的学习、工作和活动很少，工作不深入，对你们没有什么帮助，应向你们作检讨，这是不对的，今后要认真改进；过去主要是有依赖思想，认为飞行训练自己是外行，而军长、副军长和两个副参谋长都在抓，所以自己就很少过问了。过去和你个别谈心确实很少，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帮助，也要向你作检讨。今后可以经常谈谈，以便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随地提出来谈，至于要及时提醒你，多打招呼，根据我的认识水平很难做到，我和你了解的东西差不多，都是王维国在多次会议上讲的那些，主要是靠我们个人去认识

体会，要坚信“我们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是执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跟的是一条红线”，“有人及时、直接的给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和声音”，“这就保证了我们在斗争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只有坚信“我们在斗争大方向上是正确的”，才能正确的认识和对待问题，就不会被一些现象造成错觉、产生怀疑，以致迷失方向。例如，部队里有人说，王维国未被选进上海市委书记处，可能是王维国犯了错误，“这就是看现象，而不看斗争的大方向所产生的怀疑。我们军里情况，你都了解，我们在思想上应明确王维国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因为他是上面一再肯定过的（指九大时被选中央候补委员，和以后被毛主席接见等情况），因此我们应该支持王维国的工作。这次整风中大家对郑刚同志等提的意见比较多，现在还没有很好认识，大家都有些感觉，但在工作关系上还要尊重，他是管飞行训练的，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最后希望你和单清泉同志搞好团结，把训练处的工作搞好。

（以上仅是谈话的大意，不是原话，原话实在记不清楚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

【整风】

七一年二月司令部整风时我和杨运辉个别谈话的补充情况

一、七零年十一月，王维国在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各部的领导和军管会正副主任都参加了，胡开德同志也参加了此会）上污蔑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否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他说：在给上海市党代大会起草的政治报告第一稿上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提了一句，第二次稿上对军队一句也没有提，这不是否认军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王维国还说：他在国庆节前夕到张春桥同志家里去检查警卫安全时，

张春桥同志的秘书说，张春桥同志正忙于修改文件，没有时间接见他。以表示对张春桥同志不满意（以上已经交待过）。

王维国讲的以上两个问题，我和杨运辉个别谈时，可能向他散布过，但根据我反复回忆，我不能肯定一定向他说过。如果杨运辉说我和他谈话时讲了这两个问题，那就证明是我向他散布过这两个问题；否则那就是我在这次和谈话中没有讲过这两个问题，因为在我反复回忆中，我不能肯定这个问题。既要向党负责，又要向同志负责。证明是我的错误，我绝不会抵赖。

二、杨运辉说我给他讲过郑刚同志泄密问题，那就证明是我给他说过这个问题（即：据说一次郑刚同志在指挥所值班时，在电话上把江青同志乘坐的专机告诉了南京的周建平，王维国知道此事后批评了郑刚同志，说这是核心机密不能随便在电话上告诉人），我就承认说过，另外我还可能说过，郑刚同志是有错误的，他的态度不明朗，对周建平和亲近，王维国几次找他谈心他都未去（这些都是王维国在布置整风会议上讲的）。我也分不清是这次和杨运辉谈话说的，还是在布置整风会讲的。我在军党委交心会上错误的对郑刚同志的批评，实际上是打击郑刚同志，就代表了我的错误思想。■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整风】

杨运辉汇报 43 团机务大队

一个机务中队的作风情况时我对杨运辉讲话情况

以前曾派训练处郭希洪到 15 师 43 团机务大队一个机务中队帮助培养过作风问题，经过一段工作该中队在作风上有很大的进步，郭希洪也初步写了一份该中队作风转变情况的材料。七一年军组织工作组下部队，杨运辉参加 15 师工作组，因再没有专人去 15 师抓作风问题，我就告诉杨运辉请他们把 43 团机务大队的这个机务中队的作风继续抓一下，看是

否能在培养作风上总结一些经验。

杨运辉从15师回来后，就向我谈了一下他们所了解的该机务中队在作风方面的情况。杨运辉说：根据他们摸的情况，这个机务中队在作风上是有些进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他讲了一些例子），郭希洪帮助他建立的一些东西没有能坚持下来，认识也不统一；总的看来作风上进步不突出，总结经验还不成熟。

我说：既然总结该中队作风方面的经验条件还不具备，那就算了。原来总想在机务大队培养树立一个作风好的典型单位来推动机务部队的作风建设，现在没有这样的单位也不能勉强搞。我们现在根据林立果讲的要总结经验、加强对部队工作的指导，和王维国提出的要求及军党委的具体研究布置，已组织了三个人（余乃斌、李连仲、领航处的陈纪夫）在写三八作风经验材料，已讨论修改一次，现在是第二次稿，讨论修改时你可以参加。关于部队在培养三八作风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可以概括提炼起来，充实进去。部党委为了加强调查研究、自己经验，统一组织使用写作力量，和锻炼培养写作能力，在司令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写作小组，由叶蜚闻负责，你也是该小组的成员。今后，司令部要写些什么经验、总结材料，在部领导下都由这个组组织力量分工进行，并集体讨论修改定稿。三八作风经验写好后，准备写战备教育经常化的经验材料。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战备训练方面的经验，是否也可以总结，你们可以考虑提出具体意见。■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会员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记忆》的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邮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